



SEP 20 1948

第十期

第一卷

# 新報

刊周

幣制金融  
改革專號

(一)張副院長的忠實供詞

短評

(二)向英看齊

(三)官商鬥法看誰能制誰

## 我們的意見

穩定新幣幣值的有效措施

中國、交通、農民、三行的商股是否應行改歸國有

(一)應行收歸國有

(二)不應行收歸國有

(三)答滕茂桐先生

(四)答劉大中先生

劉大中

蔣碩傑

胡寄聰

關大中

陳振漢

吳景超

劉大

滕大

劉大

滕大

胡寄

應

劉大

桐中

滕大

桐中

胡寄

應

劉大

桐中

滕大

桐中

胡寄

應

專論：經濟改革與物價指數證券

晉中平靜無戰事

從南京到東京

河西——農民的地獄

一個社會學者看東北

文藝：杜甫在梓州閬州

(太原通訊)

(南京通訊)

(山丹通訊)

(瀋陽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記者

谷苞

陳健

至

中國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十八日出版

新報社



## 張副院長的忠實供詞

爲了督導平津經濟管制而來平津觀察的行政院副院長張厲生氏，到北方來已經有好幾天了。他在平津兩地發表了好幾次談話，我們覺得他在九月四日對天津市參議員的講話，雖與他此次北來的使命不發生直接的關係，倒是很值得玩味的。據報載（九月五日益世報天津版）消息，張副院長在那次參議員歡迎茶會上，足足講了一小時半的話，據說是一些毫無保留的心裏的話。這裡，我們祇打算提出其中一點來說，這一點的確是極端的老實話，然而老實話中却包含着最大的矛盾。老實話我們固然應該聽，可是我們千萬不能軟心腸到因此着了迷。

張副院長在內政部長任內，曾經轟轟烈烈而又熙熙攘攘地辦過選舉，無論說它是功也好，說它是過也好，這的確是在實施憲政前夕的一樁傑作。很多人會笑罵過這種無聊的勾當，更有很多人（當然包括政府大員以及有些名流賢達）會板起嚴肅的臉孔說這是民主的學習或神聖的舉動。且讓我們來看看主其事者的忠實供狀。下面是前內政部長自己的話：

「自己在辦理選舉時，不客氣的說，是一場糊塗，假使有人問罪，我一定承當。因爲戶口不清，許多人不會寫字，同胞對政治瞭解認識都不足，怎能辦出好的選舉？所以可斷言都是假的選舉，民意根本不能表達。嚴格的說，沒有一個是合法的。所以若有人說我違法，我不能分辯。但是我認爲真的是慢慢由假中來的，設使假的都不來，真的更不會有了。」

## 向英看齊

最近政府爲配合新經濟措施，提倡節約運動。節省物質，自爲平抑物價有效辦法之一。某報專電說是主政者看到英國人儉德可風，希望大家向英看齊。這真是珍貴的新聞。

本來中國的中產階級，多是節儉成家的。四五十歲的人，都還看到上一代是如何節衣縮食，愛惜物力。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儉德即居其一。對作官的也有「儉以養廉」的諷規。尙儉之外，還有講公平，重信義，尙廉潔，

在我們這個東方古國的官場上，大官而說這樣的老實話，實在是不可多得。我們讀了這段話，禁不住有無限的感觸。既然是「辦理選舉，一場糊塗」，又既然是「沒有一個是合法的」，那麼這位自認違法而不能分辯的前內政部長，爲甚麼竟然沒有人挺身而出，加以糾舉？在憲政就是法治的假定下，這位自認違法而不能分辯的前內政部長，即使特種刑庭沒有管轄權，爲甚麼不由普通法院加以法辦？再既然明知「戶口不清，許多人不會寫字，同胞對政治瞭解認識都不足」，因此造成了「假的選舉，民意根本不能表達」，那麼實施憲政豈非強姦民意，自欺欺人麼？我們相信，這些問題張副院長都能一一肯定的回答，因爲他是主其事者，他是內幕中的人，他比我們知道「一場糊塗」到甚麼程度，他比我們清楚自己如何違法，並且如何違法到「不能分辯」。

我們現在已堂而皇之的實施憲政了，但是前任內政部長現任行政院副院長張厲生氏告訴我們，由於選舉是「一場糊塗」，「是假的」，所謂憲政根本是建築在「違法」的基礎之上。這就是說，這天下，從頭到尾，壓根兒全是一班違法的人在統治着的天下。如果這樣就是學習民主，那麼學習民主等於學習如何犯法！如果這樣產生的就是民主憲政，那麼我們要求民主憲政無異是捧上一班違法的人來對我們善良百姓發號施令！不過話還得說回來，我們此生尙可以焚香祝禱的是盼望假的慢慢會變成真的。不過，天曉得，恐怕祇有張副院長敢保證並引導我們從地獄走上天堂的路子！

×××

×××

×××

（木）

見利息義，種種可與英國民族看齊的地方。英國大文豪高斯渥爾梭在他的「近代喜劇」中，有個角色還說過那樣的話：「假使我們是什麼教徒的話，我們便是孔教徒。」所以，講起儉德來，我們本有資格向英看齊的。

儉德的破壞，說來慚愧，却正在民國以來。達官顯宦的闊綽，豪門資本的淫奢，戰時利得者的揮霍，奢風之來，必有所自。我們機關的首長與暴發戶一九四幾的汽車（恕我不知是一九四九還是一九五零了），對着英國大使

古老的汽車（人家的是本國造，我們的還是舶來品！）不但不感慚愧，反倒自視傲然。英國大使的舊西服對着我們用英國貨料剛出籠的嶄新的洋裝，似乎人家坦然多了。他們在英國，因為購物券（Coupon）的限制，有錢無從買。在中國，他們本可與我們的闊人一樣，上海溜一蹓，回來煥然一新。但是人家不肯。可見他們的節儉，是爲了心安而理得。

說到心安理得，中國讀書人，本來也有這末一套的。可是自抗戰以來，復員以後，這些中國中產階級的中堅份子，已經陷落在飢餓綫上掙扎，只配

## 官商鬪法看誰能制誰

八月十九日發布的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雖然稱曰改革方案，實質上改革的成份並不大。全案精神在承認現狀，對既得利益有益無損。這是全國輿論公認的，也是政府自己公開承認。蔣總統在二十一日電各省市政府令在各地協助嚴格執行新措施，文中言及緊急處分令之要旨，其二：「人民所有金銀外幣及存放國外匯資產之處理，係使人民凍結無用之資產，導入工商事業正當之用途，並充分顧全人民固有之利益，絕無絲毫之損失。」即原對此作了一番宣示。

天下事，假使你拘泥於現實，不能超越現實，不管是怎樣溫和的改革，都會使你覺得這邊是藩籬，那邊又是藩籬，衝破它並非易事。有時你忿怒，想撞破這一塊，撞破那一塊，但終因藩籬是替你防衛外來侵襲的，整個撤去則危及你的生存，只好遷就，而對現實俯首，對已破的也給修補起來。於是所謂「改革」也者，遂由變質而消失。自從國民黨在革命中途變節，惟「打天下」是務以來，日在建築藩籬，資以捍衛「朝廷」，果積久了，這些藩籬爲它圈出了一個「小天下」，遂成了它的「現實」。既是不再講革命，唯一維持「朝廷」是務，這現實便束縛了它，使它動彈不得。在這些藩籬中，最厚的一層，也就是向來認爲最可恃的一層，當推以上海爲中心的經濟利益集團，即所謂「江浙財閥」。這集團在「國民革命」期中曾經出了力，儘管歷年來有不少人在詛咒上海，南京政府最重要的「靠山」還是在上海灘上。日子久了，南京政府更給上海輸送新血液，於是官商不分，有財復有勢，上海遂更雄峙一方，南京政府遂完全落入了上海掌握之中。這次的財政經濟改革案，在「朝廷」是最後的掙扎，配合得好，可望有點小成就，這小成就的成敗關鍵便是在是否能衝破這道藩籬。據日來的報道，似乎情勢不許樂觀。可能，衝不過去，這改革案便將在它身上碰了壁。

向叫化子看齊。總想向英看齊，他們早已沒有資格了！而有資格看齊的倒是那些達官顯宦，豪門資本與戰時利得者，可巧他們又無心可安，也無理可得！因爲他們揮霍的是旁人的血汗，濫用的旁人的勞力。他們根本不知「稼穡之艱難」，也就無從養成儉德。知締造艱難者，自然會節儉，暴發戶總是奢侈。「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正是他們的注腳。

英國沒有豪門資本，也沒有發國難財的。這是政治問題。事理再清楚沒有，我們要真想向英看齊得先從政治看齊作起。

（希）

在上週本刊的一個短評中，我們會提到杜月笙等提出了對經濟改革的意見，翁文灝氏謁總統後又往訪王雲五，商討對此意見政府應取之態度。這是二十九日的事。據當日的報道，對杜等所提四項意見，關於證券交易即恢復一點，據悉，政府可能辦到，時間當在十一月，關於中交農三行商股勿收回一點，須候立法院決定，關於行莊增資勿過高，限期兩月不易辦到一點，政府認此爲淘汰專門從事囤積居奇行莊之最有效辦法，將不致變更初衷；關於行莊利息逐漸降低，勿硬性規定一點，可能予以重新考慮。讀者須記住，關於行莊利率，經濟管制委員會二十六日在南京舉行首次會議，曾決定商業行莊月息，嚴令九月一日後減至一角以內，九月十六日後減至五分以內；同時又決定外幣存款之動用予以放寬。這對於商業行莊，真是十分遷就。然猶不足。杜老聞說話了，必得招呼。於是行莊增資標準率也終給降低了一半，并許聯合增資。政府自認爲取締囤積居奇之最有效的法寶，遂爾臉面不用了！然在另一方面，「太子」奉派爲上海區經濟管制督導員，授以與地方機關及治安組織實行聯繫之權，大舉檢查倉庫，搜查各大商號貨底，封鎖水陸空路，以防物資走漏，拘捕囤積操縱之巨商，杜月笙之子杜維屏亦被捕，吳國楨飛南京請辭市長，蔣經國「打老虎」博得彩聲，蔣總統在京對上海所爲遙爲呼應，喧傳「極震怒」之餘，可能對滬奸商取更斷然的處置，商業銀行所有外匯限期移存國行，謂係遵照總統指示而行。凡此，均表示其似欲衝破藩籬。

問題在：在辦法上遷就，在行動上「亂抓」，能收效麼？是否現政權無「治道」，僅有「治術」，而所謂「術」也者，亦僅只是「治亂世用重典」那一套？「世」何由亂，你知之否？還有一層，「重典」與人權保障是否能相安？你不是說在「行憲」麼？

（喬）

我們的意見

# 穩定新幣值的有效措施

金圓券發行的激增已威脅到平民的生活

除「訂貨貸款」外政府應即「停放封存」

同時發行物價指數債券以吸收遊資

劉大中 陳振漢 吳景超  
蔣碩傑 胡寄塵 關大中

據金圓券發行準備委員會本月六日的公告，自八月二十三日起至八月底止，金圓券的發行總額已達二億九千六百餘萬元；現時仍在市面流通的鉅額法幣數量，還沒有包括在內。據政府在改革幣制以前宣稱，現時流通的法幣總數約五千餘萬美金即可全數收回，應折合約二億金圓。換言之，在八月底前的一個星期中，通貨總數激增至少百分之五十。

通貨數量這樣的急劇增加，雖然是極危險的事，但應當早在政府意料之中。政府的支出，並不能因法幣改為金圓券就會減少。稅率雖已按戰前標準調整，但是核算稽徵都需要時間，實際稅收的增加至少要在相當時期以後才會實現（兩個月已是很樂觀的估計）。目前政府收支不抵的部份，仍須用增加發行的方法去應付。換一句話說，現在金圓券發行的速率，不會在改幣以前法幣發行的速率以下。不但如此，金、銀、外幣的兌換，尤其可以增加發行數量。據蔣總統六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報告，截至九月五日止，政府兌進的金、銀、外幣已達四千五百萬美元；所以，為這一個目的，政府已經增發一億八千萬金圓券了。

在金圓券發行激增的沖擊力量下，物價已顯不穩狀態。因為政府禁止超過限價的記載，報紙已用空格代表多種物品的價目。在這樣的危險局面下，政府最大的努力却用在限價的監督上；這好像是只用冰枕去鎮壓病人的燒度，而不用消炎藥去退燒，實在令人不解。

在戰事繼續演進中，人民的痛苦自然無法根本解除。但是人民至少還有權要求戰事的費用由有錢人去擔負，此後人民絕不能再容忍不負責任的膨脹政策，使戰事費用落在一般人民的頭上。與膨脹政策相反的方式，自然是採用高度的累進所得稅；但是，即使政府足夠的勇氣和毅力去執行這種政策，現時也沒有够高的行政效率能使這種政策在短時期內發生效果。我們仍只能從比較間接的方式上設法。

為抵消金圓券發行的膨脹力量，政府應立即停止全體行莊只國家行局在內的放款，同時封凍存款。銀錢業過去在領導物價上漲方面的貢獻，已是大家熟知的事了。在過去幾年之中，行莊最主要的業務是支持囤積。吃慣了珍饈美味之後，自然是不甘於粗茶淡飯。銀錢業在改革幣制以後的活動，可

以從天津大公報「經濟新聞」欄兩篇報導中窺知一二，我們節錄如下：「自從政府公佈緊急經濟管制辦法以來，兩個星期物價得以平抑。但市面銀根鬆泛，已成不可掩之事實，游資充斥，折放甚至低利卑辭，仍遭閉門羹，貨物遂又遭人青睞。」（九月三日）。「當局厲行減息之後，又值銀根其鬆，存貨戶頭因無高利壓迫，得以從容堅持不售，希圖轉機，並有接近金融事業職員，乘銀根鬆泛無出路機會，以向外推展拆放為藉口，假借低利貸款，收購貨物，連日各貨市價暗中堅俏，上述亦為其中原因之一。」（九月七日）。

在物資的供給一時不能增加，和金圓券發行激增之下，行莊放款如不停止，物價如何能够不漲，何況行莊放款又是以囤積物資為主要出路呢？放款如果停止，存款也必須同時封凍，否則放款等於不停。理由是很簡單的。假設張三與某行莊有交情，在某行莊帳上有一筆存款（實際上是某行莊所有，或是某行莊與張三所共有）。這個行莊用張三的圖章簽發一張支票，交與李四去購貨囤積。名為提取存款，實際這自然是放款。所以「封存」必須與「停放」同時執行。

「停放封存」以後，一般商人自然會感到「不方便」，但是這正是壓迫商人出國最妙的方法。對於工廠所需的正當資金，我們主張恢復去年年底所用的「訂貨貸款」，由中央銀行按下列步驟辦理：

（一）現時上海的倉庫檢查，似僅限於普通貨棧和銀行倉庫，這是相當愚笨的事。我們聽說有許多與工廠有關係的好商，已經把他們的存貨移到工廠裏去了；所以各工廠的存貨也必須查點。

（二）凡是存貨超過限度的工廠，不得申請貸款。

（三）領得貸款的工廠，在借款到期的時候，必須把物品售與政府，然後由政府拋售。或是，經審核後，工廠可以直接售與賣售商人，但是必須把所售數量和價值呈報政府，政府自然必須隨時檢查該廠與該商的倉庫。

這種「停放封存」和倉庫檢查的辦法，必須繼續執行，直到政府稅收的增加，已達預期的標準時為止（王雲五氏所估計的每年廿四億）。政府並應同時發行物價指數債券，用以吸收行莊以外的遊資。關於物價指數債券的優點和發行辦法，蔣碩傑李崇淮諸君以前曾著文解釋，本期專論欄並載有胡寄塵先生一文，詳細討論，在此不再贅述。



本刊辯論欄以前所載各文正反兩面的作者，都是按辯論會的慣例，有時用抽象方式決定的。文中所寫既不一定代表作者本人的意見，所以不得不採用筆名制度。此次辯論的反正兩面，是由兩位作者自行選定；所寫的意見可以代表作者自己的立場，所以用作者本名發表。以後的辯論文字，即擬按性質，分用筆名及本名兩種方式發表。

## 中國交通農民三行的商股是否應行收歸國有

(一) 應行收歸國有

劉大中

這一次改革幣制財政各項法令中，最令人失望的一點，就是對於現存的銀行系統未加以澈底的整肅和改組。我國現有的經濟體系，仍不過是一個以農業為主體的簡單結構，但是却有一個異常龐大複雜的銀行系統。論單位，有六千多個，論業務則「商業」、「實業」、「墾業」、「興業」、「交通」、「農民」、「儲蓄」、「信託」無所不包，無孔不入。實際上，不論名目是什麼，所作的主要業務都是大體相同的：在北伐以前向政府放高利貸，北伐以後抗戰以前作地產，抗戰以後作投機囤積。我國經濟今日搞到這般田地，戰爭是第一罪人，貪污無能的文武官吏是第二罪人，政府濫發紙幣的政策是第三罪人，銀錢業是第四罪人。

在這個龐大複雜的銀行系統裏面，尤以所謂「國有」銀行部份為最不合理。中央銀行有其名而無其實，在這裏姑不討論。其他的行局各有其成立和發展的歷史和背景，除去郵匯局比較簡單也比較符合其實以外，其他的行局現在都有它們在政治上的作用，並且是在各種黨、派、系、門、閥的統制之下，所作的業務實際上並不專注重在法令所指定的範圍以內。最妙的是，中國、交通、中國農民，這三個一般人都以為是「國有」的銀行，實際上還有商股在內。更妙的是，這些所謂「商股」，又有一部份是被一些黨政軍的組織所持有。尤其妙的是，這幾個銀行的董監事，在若干年來，大多總是由少數幾個人輪流充任，同一個人，在他作政府派充的董事滿期以後，又從商股中重選出來，商股董事滿期以後，又由政府重新指派。

這三個銀行所佔據的亦官亦商，非官非商的特殊地位，很為世人所詬

病。我們主張這三個銀行的商股應由政府收回，理由如下。第一條理由是偏重理論方面的探討，其他各條，則是針對我國現況而言的。

(一) 基本政策上的考慮：

筆者是根本反對官商合辦任何企業的。公營的企業就應是完全國有；民營的就應完全私有。公營企業應以促進全民福利為目的，在決定業務方針時，應以價格與邊際成本相等為標準。這種經營方針，是否會使公營企業有盈餘，或有虧損，完全不應在政府考慮之中，如果恰好有盈餘，這項盈餘自然是國庫收入的一部份，如有虧損，就應由國庫中補貼。(關於這個基本原理，請參閱本刊第三期蔣碩傑君所著「經濟制度的選擇」，第四期筆者所著「社會主義的生產政策」，和第十五期吳景超君所著「私有財產與公有財產」)。商人出資經營，自然是以營利為目的，在某種情況之下，私人營利也能達到促進全民福利的境界，但這是結果，而不是動機。公營企業既然不以營利為目的，招收商股就無意義——如有虧損，應由全民擔負，不應由少數私人犧牲，如有盈餘，亦應由全民分潤，不應由少數私人收取。有人說，政府有時資本不夠，須由私人湊足。這是不懂經濟學的人的說法。一個國家在某一期內籌措資本的能力，是由它的總生產量和消費量所決定的；在這一時期內，如果私人能拿出一筆資本來，政府就可以用賦稅、公債，或膨脹的方法籌得同量的資本——籌措資本的方法，只是個分配上的問題，而不是實質能力上的問題。

國家銀行（此指中央銀行以外的國家銀行而言）的功用，第一應是供給



公有企業所必需的長短期資金，使公有企業能在取得政府補貼以前，使產量擴充到邊際成本與價格相等的數量。因為政府不能隨時予公有企業以補貼，至多是數月或是一個會計年度計算一次，國家銀行應當在這種青黃不接的時候，予公有企業以便利。除此之外，國家銀行還須對於商業行莊所不願供給資金的私有工商業，予以支持，我們可以舉兩個比較具體的例子如下。

譬如有一個尚未有近代化發展的小縣城，從客觀的條件上看，是有大量發展的可能與必要的，但是從短期眼光看來，在那個小縣城開設新工廠，或是擴充原有工廠的設備或產量，都是無利可圖的。商業行莊自然不願對這些企業放款，國家銀行就應擔負起這種責任來。

另外一種例子，是有關獨佔性的私有企業的。假如我國政府能日見開明，能保有獨佔性或半獨佔性的企業收歸國有，或加以嚴格的統制。對於被統制的私有獨佔企業，政府必須令其擴充產量至邊際成本與價格相等為止。商業行莊對於這種企業所需的資金，可能是不願供給的，國家銀行也應當負起這種責任來。

上面所說的這些國家銀行的業務，都不是以營利為目的，所以國家銀行招收商股並無意義，基本的理由與本條第一段中討論一般國有企業時所說的相同。

### (二) 收歸國有可以劃一責任：

現在中交農三行業務上的決策機構，是各行的董事會。這些董事，有的是政府派充的，有的是商股選的。這種組織方式，是最好的推舉責任的方法。事實上統制這幾個銀行的，雖不過是少數的幾個人，但對政府說起來，官派董事不能完全作主，因為有商股董事；對小股東說起來，商股董事更不能作主，因為有官派董事。事實上，政府對於這種情形是洞若觀火的，但是一直在縱容，甚至於努力維持現狀，真正的小商股，對於這種情形是「恨莫能平」。在三行的商股完全收歸國有以後，政府對於三行業務的政策和執行，就要負完全的責任，對人民無可推諉。

### (二) 不應收歸國有

立法院財政金融委員會於本年七月廿一日開會，初步審查王力航等二百九十四人提議的「為完成國家銀行制度請收購中交農三行商股擬具修改中央銀行法及中交農三行條例大綱敬祈討論案」討論結果，原則通過，并推九人研究起草法律修改問題。這個提案牽涉到中央銀行，法幣發行程序，與中國國貨中國實業中國通商及四明銀行；本文僅就中交農三行商股應否收歸國有部份，加以檢討。據王力航等原提案所舉應收歸國有的理由，約有下列諸點：

(一) 三行商股披上國家銀行外衣，伸出鐵腕，掌握全國整個財政金融機

### (三) 收歸國有是從頭從尾澈底審核過去三行業務的機構：

三行在現在幾乎是不對任何人負責的。過去所辦的事，及一切帳目和開支情形，除去真正內幕的人以外，很少有人詳細知道。三行本身的情形，或者還比較簡單一點，但是由三行全部或部份所有的許多公司，真是光怪陸離五花八門，它們的業務更是從不公開，但是在我們的經濟體系中，這些公司却擁有極大的勢力。藉着收回商股的機會，這些公司的財產、業務、成立和發展經過，也可以澈底查核一下。

### (四) 收歸國有至少可以使特殊勢力集團表面化：

上面已經說過，這三行是在一些黨、派、系、門、閥的統制之中，由商股選舉一部份董事的辦法，也是這三行永遠被這少數人把持的方法之一（參閱前面所說少數人輪流用官股和商股董事姿態出現的一段）。在這三行商股收歸國有之後，政府將面臨一種考驗：人民有一個機會，看看政府是不是照舊永遠派這些既得利益分子出來主持。假如照舊的話，我們對於這三行的認識就可以更深一步（與其說這三行是由少數人把持，不如說這些人一向就是政府叫他們來把持的）。假如有改變的話，這就是收歸國有的一種收穫。

### (五) 收歸國有是合併改組的消道工作：

收歸國有自然並不是澈底改進國有銀行系統的惟一步驟，這三個銀行必須從新改組，合併成爲一個國家銀行。但收回商股確是改組合併這三個銀行所需的第第一步消道工作。關於這三行改組合併的問題，限於篇幅，我們不能在此討論，僅願意指出最主要的兩點：

(甲) 這個新銀行的董事人數，應按類似下列的比例分配，使這個新銀行，從此不再受現時工、商、金融界既得利益份子的把持：十分之一自工業界選派；十分之一自商界選派；十分之一自金融界選派；十分之一自農界選派；十分之一自勞工團體選派；十分之五代表公眾利益，這十分之五的理事，應當是在工、商、金融、和農業中都沒有既得利益的人士。

(乙) 這個新銀行的業務方針，應按本文第一條中所說的標準推進。

### 滕茂桐

構。(二) 商股取得國家銀行股權以後，猶未鑿足，故中央銀行法有增加商股資本的規定。(三) 三行董事監事，無論官股商股，多爲財政金融最高主管，或姻親至戚通家世好，極少數人成爲各行主宰。(四) 預決算及盈餘之處理決之於理監會與董事會，而理監會又爲少數特殊人物所主宰。(五) 各行商股即資本豪門，操縱物價者。(六) 三十七年下半年度國有財產利息收入表列中國銀行爲一百萬元，交通銀行爲一百三十一萬元，中國農民爲二百萬元，貢獻於國家者太少。基於以上理由，提案人認爲一切弊害根源爲商股，

應予收購，並建議發行長期低利金融公債，或按一千七百倍，依股額收回中交農三行商股，改組國營。

這個提案還沒有通過，須待秋間立法院復會才能再行提會討論。我讀過提案原文後，覺得不失為相當時髦的高調，但不切實際，尤其是在幣制剛剛宣佈改革的今天。我不否認在一個逐步實施計劃經濟的主義國家，銀行國有為首要之圖；同時我也承認在一個金融及證券市場不健全，銀行信用不易控制自如的國家裡，銀行國有也未嘗不是補救辦法。不過，在目前的經濟局面下（我着重在目前兩個字），烽火遍地，財政收支始終未能平衡，行政效能極端低落；我們應該集中一切力量來平衡收支，穩定幣值；切忌好高騖遠，百廢俱興，使得經濟政策南轅北轍，互相抵銷。否則就等於朝著經濟崩潰道路上邁進！因此我不僅反對收購中交農三行的商股，我還要建議分賣三行官股，使各國家銀行完全改組民營。此外，縱使三行商股應收購，變為純國營的銀行，也不是為了王力航等提案內所牽涉的理由。請申言之：

今年四月九日蔣主席到國民大會，作施政報告，他會這樣的說：「我今天可以將國家財政經濟的數字坦白的告訴大家，截至上月底為止，我們法幣發行總額不到七十萬億元。然而我們政府現存的白銀和黃金，總計約值美金一億一仟萬元。中央銀行和其他行局所存外匯的總額，達美金一億八千萬兩項合計約為美金二億九千萬兩元。即上月國務會議決將資委會一部份工廠和中紡公司與招商局等各一部份的資產，以及敵偽產業和賠償物資，撥交中央銀行隨時可以變價的總數，約為四億美金。」政府既然決定而且最近還要加速出售資委會工廠，中紡招商局以收回通貨，穩定幣信；在邏輯上，應該也出售國家銀行的官股，才能使經濟政策趨於一致。中國官股四千萬元，交行五千二百五十萬元，農行四千二百廿五萬元，共計壹億三千四百七十五萬元（戰前銀元），如按照兩塊金圓折合戰前銀元一元比例計算，官股售出後可得金圓二億六千九百五十萬元，這對於平衡財政收支，穩定幣制，補助不能算少。此時全國上下都在警惕，倘這次幣制改革不能收效，前途將不堪設想，同時也都渴望着經濟能漸趨安定。政府到底應忙於收購三行商股，付出一筆鈔票，增加國庫負擔呢？還是把銀行國有問題留待經濟穩定以後，再斟酌損益視彼時的情況解決，且先儘量吸收通貨，彌補財政呢？為國謀者，似乎不該急其所緩，而緩其所急，這是很平易的道理。

倘各行立即改為全部國營，我幾乎敢保證將更阻礙了政治的澄清，加重社會的無形負擔同時連三十七年下半年令人咋舌的幾百萬元法幣的利息收入恐怕都不會有，很可能收支不敷要國庫補貼，更增加財政上的困難。我們知道各國家行局存款利率規定為月息二分，按照這個利率，普通存款是吸收不到的，只能收存機關與國營事業的款項；至於放款，照最近的規定，暫時只能存在普通銀行，這是存款的情形；至於放款，照最近的規定，暫時只能作國策貸款，恐怕還是依着中央銀行重貼現七成，各行真正負擔三成的公式去作，利率最高不超過月息三分，而中央銀行轉貼現利率為月息二分四厘。這樣，各行業者特權吸收存款，靠着特權從事放款，普通商業銀行不是競爭的對象，競爭範圍只限於各行彼此之間。從存放款利率的差額來看，各行本身

不會有多少盈餘；但是直接或間接操縱各行的人們却可借重各行享受的種種優先特權，消息靈通，以逸代勞，與豪門的關係，可以非常密切，伸出鐵腕，因利乘便，肥了少數，瘦了大眾，造成政治與金融打成一片，公與私不能分家的局面。如果各行改為完全國營，政治金融財政的關係必然的要更為密切，可能成為各黨各派角逐的目標，也可能調換一批新首腦，但是對於社會大眾的影響，只有更為惡劣。我們不怕豪門，我們是怕杖着政治勢力的豪門，我們尤其是怕決定財政金融大計的豪門；政治與金融的關係愈接近，愈容易養成最後一類的豪門，同時此類豪門也最易左右逢源大肆活躍，使得政治永無澄清之日。在業務方面，改組國營後，收入格於限制，不易增加，支出却要膨脹。現在少數商股唯一的作用是使之沒有全面衙門化，在人事上，幹部的選擇還相當嚴格，錄用升遷罷黜也都比較循循制度，因之，工作效率尚能達到良好的水準。全面衙門化後，人事勢將隨着主管的意志變動，為了應酬各方面的冗員亦必比前增加，這樣會降低工作效率，使得支出龐大，而收入不能同比例的增加。此時，不由國庫補助，便須向政府要求更多的特權，以便維持。所以，我認為在我們沒有平均財富的有效辦法以前（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在中央銀行之外，多設置幾個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的國有銀行，只等於為豪門開闢新出路。為了避免金融豪門利用政治勢力，同時為了防止官僚利用金融勢力產生新的豪門，最好的辦法是把政治與金融分開，絕不是把二者混為一體。我所贊成的辦法，即出賣官股，使三行改為民營，正是為此。這並不是說要放任銀行，聽其自由任性發展；我們有現成的金融法規，大小銀行可一律嚴格照章約束，只是不再為商股的國營招牌所掩蓋而已。

最後，我用其餘的篇幅，來逐一的駁王力航原提案所舉各點理由：（一）三行商股既然是披上了國家銀行的外衣之後，才伸出鐵腕，掌握全國整個財政金融機構；那麼如果根本沒有披上這件外衣，便不能如是猖狂；換言之，其過不在商股，而在這件外衣，為什麼不建議取消外衣，而建議取消商股？豈非本末倒置？（二）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政府宣佈幣制改革，改用法幣時，為了恐怕人們迷信銀質的硬幣，並懷疑中央銀行會受財政之累，發紙幣，會稱將來還要改組中央銀行，加入商股使之超然，以昭大信；事實上，這一謬言迄未兌現，中央銀行也並無商股。現在竟謂商股取得國家銀行股權以後，猶未鑿足，才有中央銀行法增加商股資本的規定；我覺得在這一點上，三行商股實在冤枉，因為二者根本風馬牛不相及。（三）在三行董監會裏，每每財政金融最高主管，主宰各行，而且各董監事或為通家世好或有至戚，我很同意這種說法。不過財政金融主管參加董監會，是由政府指定，並不是為了他們握有商股，難道三行全部國營後就不許金融財政主管參加董監會麼？至於董監事間彼此或有世交或親戚關係，那是一制度問題，這種親戚通家關係在政府機關裏更是常見的，收購商股也並不使之改良。（四）三行的董監會完全是由官股控制，預決算及盈餘之處理決之於董監會，也就等於決之於官股，如果王立委等認為董監會是由特殊人把持，那只是反對官股。這似乎可以作為賣官股的理由，而不是收購商股的理由。（五）我覺得把各行商股當作操縱物價的豪門，而且要以低價強迫收購他們的

不會有多少盈餘；但是直接或間接操縱各行的人們却可借重各行享受的種種優先特權，消息靈通，以逸代勞，與豪門的關係，可以非常密切，伸出鐵腕，因利乘便，肥了少數，瘦了大眾，造成政治與金融打成一片，公與私不能分家的局面。如果各行改為完全國營，政治金融財政的關係必然的要更為密切，可能成為各黨各派角逐的目標，也可能調換一批新首腦，但是對於社會大眾的影響，只有更為惡劣。我們不怕豪門，我們是怕杖着政治勢力的豪門，我們尤其是怕決定財政金融大計的豪門；政治與金融的關係愈接近，愈容易養成最後一類的豪門，同時此類豪門也最易左右逢源大肆活躍，使得政治永無澄清之日。在業務方面，改組國營後，收入格於限制，不易增加，支出却要膨脹。現在少數商股唯一的作用是使之沒有全面衙門化，在人事上，幹部的選擇還相當嚴格，錄用升遷罷黜也都比較循循制度，因之，工作效率尚能達到良好的水準。全面衙門化後，人事勢將隨着主管的意志變動，為了應酬各方面的冗員亦必比前增加，這樣會降低工作效率，使得支出龐大，而收入不能同比例的增加。此時，不由國庫補助，便須向政府要求更多的特權，以便維持。所以，我認為在我們沒有平均財富的有效辦法以前（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在中央銀行之外，多設置幾個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的國有銀行，只等於為豪門開闢新出路。為了避免金融豪門利用政治勢力，同時為了防止官僚利用金融勢力產生新的豪門，最好的辦法是把政治與金融分開，絕不是把二者混為一體。我所贊成的辦法，即出賣官股，使三行改為民營，正是為此。這並不是說要放任銀行，聽其自由任性發展；我們有現成的金融法規，大小銀行可一律嚴格照章約束，只是不再為商股的國營招牌所掩蓋而已。

股票，頗有商權的餘地。各行商股中不少零星的小股東及法人團體，他們爲了投資或保存貨幣價值，在證券市場買了些股票，絕不應一體視同豪門。例如在農行商股中有黃埔同學會、遺族學校、中央軍校同學會、武嶺學校等法人團體。倘欲打擊豪門，應該有徹底打擊他們的辦法，收購他們

### (三) 答滕茂桐先生

我們可以把滕茂桐先生反對收回三行商股的主要理由，分爲四項歸納起來：

- (一) 政府應集中力量去平衡收支穩定幣值，不要好高騖遠，顧到許多旁枝細節，結果一件也辦不好。
- (二) 政府既已決定出售一部份國有企業的股份，藉以收回通貨穩定幣值，同時又要收回三行的商股，不免矛盾。政府如能把三行的官股出售，倒可以收回不少的通貨，對於穩定幣值很有裨益。
- (三) 收購國有以後，三行必將全面衙門化，效率更將低減，結果恐怕連現時令人咋舌的每年幾百萬法幣的利潤，都將得不到，如有虧累，又將增加國庫負擔。
- (四) 收購國有了以後，政治與金融更趨接近，愈容易養成有決定財政金融大計的豪門，使他們更能在左右逢

### (四) 答劉大中先生

劉大中先生主張：現在就應該對於銀行系統，加以改進，對於所謂「國有」銀行部份，尤須革新，即將中、交、農三行商股收購國有，合併成一個完全國有的銀行。我的主張是：爲了配合當前的財政金融政策，與整個的環境，中、交、農、三行商股不僅無須收購國有，所有的官股還應該全部出售。但是我們同意：公營的企業，就應該完全國有，民營的就應完全私有。大中先生提出五項理由，支持他的主張，我並不完全同意，下面便是我的答覆。

一、大中先生認爲國有的銀行不可以營利爲目的，其功用爲供給國有企業長期資金，使國有企業在未取得政府補貼以前，或不能由商業行莊獲得貸款時，能得得到扶助。國有銀行既爲促進全民福利，在決定業務方針時，自應以價格與邊際成本相等爲標準，至於是否可有盈虧，則完全不應在政府考慮之中。我覺得如果所謂之一國有「銀行真正國有」之後，在現在政府的行政效能與習慣沒有徹底改善的條件下，必然會享受種種民營商業銀行所不能望其項背的特權，壟斷獨占，而且衙門化的銀行，更不會對於顧客，懇勵努力，以最高效率的服務換取最低廉的代價。倘政府再不計算盈虧，更鼓勵其衙門化，恐怕與「價格與邊際成本相等」的標準距離益

源大肆活動。

茂桐先生所提出的第三和第四兩項理由，實是討論目前中國問題的一個基本困難之點。現時政府行政效率的低微、與各式各樣豪門間的錯綜關係、以及內部派系的互相傾軋，是不容諱言的事。一個本質上很好的政策，弄到政府的手內，往往會變成非馬非龍原形盡失。就三行商股收購國有而言，筆者雖然對於茂桐先生的意見有不少贊同之點，但是在原則上筆者仍是主張應當收購國有。困難的是，在政府收購國有之後，真可能辦得比現在這種畸形狀態還要更壞。現在國民黨內的許多派系（甚至於「友黨」），以及許多地方勢力，已經在積極設法使三行能夠收購國有，然後參加加派指；在這時主張收購國有，很可能的是正中這些人的下懷。這是在中

手上的三行股票，甚至於沒收，也不足以傷着他們，但是小股東却首當其衝，大受損失，有失公允。(六)各行對於國家貢獻的收入過少一點，確是不應該的；但三行官股是佔絕對多數，而且董監會是由官股控制，這須要問官股，不應把錯處寫在商股的賬上。

### 劉大中

(八月二十三日)

國現時談政策談學理無法克服的一個困難，關於這一點我們也再沒有什麼意見可以發表。

茂桐先生所提出的第一項理由，與前面所說的困難也不無關係。三行收購國有後，如果能辦的好，於改革幣制穩定幣值可以有很大的裨益；如果辦不好的話，則除因收購商股而增加通貨以外，還要使三行的效率更加低降，與改革幣制和穩定幣值自然就會有惡劣影響。但是我們至少主張，政府應予商股所有人以長期政府債券，而不應以現款收購。

關於茂桐先生所提出的第二項理由，我們是根本反對用出售國營事業的方法去吸收通貨的。這是殺雞取蛋的辦法。穩定幣值本有其他正當的辦法可用，讀者可參閱本期其他的有關各文。

### 滕茂桐

遠，結果只是增加了國庫的負擔，並不能促進全民福利。今天的經濟政策，最要緊的是覓求喘息安定時間，俾類於危殆的經濟能有補救的機會，因此，一切設施如增加財政支出或社會上的負擔，似乎是值得慎重考慮避免的。

此外我很反對政府以優惠方式扶助國營事業，如優待的外匯牌率或貸款，因這樣適足以降低效率，很可能使他們誠以爲成本減少或本身有特殊優點，而在其他方面浪費。倘政府認爲某種事業，短期內雖然無利可圖，但對社會有益，或有發展前途，乾脆就直按按時補貼，不必仰給貸款。天津新港即爲屬於此類事業的適當例子。除了這類事業以外，我看不出商業銀行對國有企業不貸款的特別理由，事實上，國營事業較普通工商業穩妥，借款也許更爲容易。商業銀行是以營利爲目的，只要頭寸充裕而借款人是可靠的往來戶，他們是樂於向外貸款的。如果他們手中頭寸拮据，而政府仍希望對某些事業貸款，中央銀行在貼放政策上還可以運用促成。

(二) 我的看法：縱令收購國有，如辦不好的時候，政府仍可推卸責任，只是較官商合辦時爲難而已。每於發生責任問題時，與國有銀行有關各部門之間，仍有一「太極拳」回旋的餘地，互相「推諉」。

(三) 我的經驗告訴我，商業行莊只要不徇情面，澈底檢查並不甚難，惟獨對於帶有衙門氣的經濟機構，因其以事關國家機密爲護符，審核則頗爲不易。各行全部國有後，其本身與有關公司，自然要經過詳細查核，不過查核之後即能公開於社會恐怕還是不可能的，理由將仍爲「事關機密」四個字。

(四) 正如同迭次內閣改組一樣，人物雖然大致依舊，總要換幾個新人，同時執掌也有些更替，倘三行收購國有改組之後，情形可能亦復如此，結果，只是使後添的新人可爲他們本身與有關的黨、派、系、在政治力量之外，加上金融勢力，如虎添翼而已。

(五) 銀行合併在原則上，我極爲贊成，不過應該強迫實力不足的普通銀行先行合併，然後再斟酌安排，使銀行系統趨於健全，如果先令三個大銀行合併，成爲一個最大的銀行，恐怕更容易使之忽略競爭的意義，而趨向獨占作風。理想的銀行系統，要除中央銀行外實力相差不多，數目要相當的少，各行都有許多分支行處，但卻不能壟斷，如是則可以增強他們的效率，並且易於管制。





# 專論

## 經濟改革與物價指數證券

胡寄塵

### 一、經濟改革應作如是觀

我這裏先說明我對於此次經濟改革的看法。簡單的說，我與很多朋友意見相同之處是，此次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所包括的幾種辦法，無論在原則上或技術上都有許多的缺點，有的缺點不須用專家的眼光，只須用一個正常的普通人之常識就可以看出來，這是很不能寬恕的疏忽。既具有這些缺點，當然不能望其有美滿之結果。

可是，我與許多朋友意見不盡相同之處，也有二點：第一，在此病人膏肓，人心望治的時候，政府提出一種改革的辦法，不管辦法本身完善之程度如何，至少是代表一種趨向改善之態勢，似乎應該讓牠試一試，不便在未出馬門以前便挫其銳氣。無論如何，一個不完善的辦法，總較毫無辦法坐以待斃的強。

第二，我認爲此次經濟改革辦法，可以收三數個月之短期效果，十年來之積病，望一貼藥即安然痊愈，任何靈藥均無此效力。德國的通貨膨脹，也不是一次改革就穩定了的。俄國的通貨膨脹，三十年來不是也改革了幾次幣制嗎？何況我們的政府行政效率還不能與德俄相提并論呢？所

以，此次經濟改革，雖然不能根本解決一切經濟困難，倘使真能收短期三數個月的效果的話，也是值得珍惜的。要有這個短期喘息的機會，纔能有時間考慮第二個步驟。

總之，此次經濟改革方案，不够理想，不能解決一切經濟困難，（嚴格的說，世界上根本就不會有能解決一切經濟困難之完善方案），牠只能得到短期三數個月之安定。這是牠的最大使命，但是時間雖然甚暫，也是值得珍惜的。

### 二、最近物價波動如何解釋

自八月二十日經濟改革方案公佈到現在，爲時僅半月有餘，一切物價，又在開始波動，我們前面所說三數個月之安定的結，豈不發生動搖，這裏不能不加以說明。筆者先要請閱者諒解的是，這裏所謂短期的安定，係以京滬平津等大都市爲討論對象，至於內地物價，筆者早於方案公佈之初，（見八月二十一日北平世界日報專論），爲文論及內地物價指數之低於三百萬倍者將急劇上漲，這是不能避免之罪惡，這裏不願多費篇幅。我們認定大都市之物價動向，在目前具有極大之決定性，常常可壓倒成本因素（指農村

原料），故以牠們爲討論對象，有此諒解，纔不致引起誤會。

現在我們再來談各大都市之最近物價動態。無疑的有許多物價，已經超出八月十九日之限價。我認爲儘管政府如何努力，如何採用高壓手段，經過相當時期，而且不是一個較長的時期，限價一定都會超過的。其理由甚爲簡單：一爲捐稅高提；二爲內地原料上漲；三爲國營事業貼補政策之放棄；四爲一般購買力之增加；有了這幾原因，物價必須上漲。政府公佈一個穩定物價方案，必須有一個限價，至於此限價能維持至若何程度，恐怕就是制定此方案之人亦不能存多大之奢望。

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限價能不能維持的問題，而是限價超過以後之上漲率如何的問題。目前物價固然有上漲之趨勢，但在本質上與二十天以前却有很大的差異。我們研究德國第一次大戰後之通貨膨脹及我們抗戰以來物價上漲之經驗，發現德國的物價波動自一九一四年起每月爲加速度（指 *acceleration*）之增加，經過約九年，時間，到了一九三三年六月，其連環甚劇於前，方打破以往記錄，到達一倍以上，此後數月即到

達狂跳上昇不可遏止程度。我們自民國二十六年七月開始，每月增加百分之二，經過了十一年時間至本年六月，其連環基期指數（指各大都市）方打破以往記錄，到達一倍以上，大約是六月份指數較五月份增加一倍，七月份又較六月份增加一倍有餘，八月份上半月亦有同趨勢。人心惶惶，雖不敢說在半年之內，即會與德國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樣到達瘋狂狀態，即以八月初情況而論，已屬岌岌可危，何況還要加速前進。

因爲幣制改革關係，八月份連環基期指數約爲百分之五十左右，這是因爲八月二十日以前增加太多，八月下旬之物價是跌落的。顧如九月份物價超過限價而上昇，以目前情況推斷，上昇速度不會甚大。假設九月份物價平均上漲率較八月份約在百分之二十以內，根據以往經驗，則今後兩三個月內亦可能維持這個百分數。這點如能實現——筆者推斷很可能實現，在平常情況之下，不能不算是劇烈之物價波動，但與八月二十日以前情況比較，不能不算是相當安定。這也就是此次幣制改革極大之成功，而且我們對於此次方案之成就也只能如此要求，不能有過大之奢望。

### 三、第二個亟需採取的步驟

假如我們對於此次經濟改革之第一步，祇有上面所說的低度要求，而且此要求也初步已經實現，就應該利用這個喘息的機會，從事第二步工作，否則好境不常，時機稍縱即逝，等到物價再度狂漲，始謀補救之道，未免過遲。

現在橫互在一般人心中的問題，是兌換了金圓券以後怎麼辦？從前握有餘資（筆者用餘資而

不用遊資二字，係遊資二字太濫用）的人們，假如不會囤積居奇或投機倒把的話，也會把錢存在銀行號，坐收月息二十餘分之利。兌換成金圓券以後，手中餘資，必須有個出路，尤其是原來持有黃金白銀美鈔及銀元之人們兌換以後，更要感覺徬徨。而且公務人員薪工調整以後，照克恩斯的定律，儲蓄的絕對數字也會增加。再者證券交易所又已經停止，餘資更少一個極大的活動場所。以上所說的一切餘資，若不爲他們謀求一個出路，防川之策，終有潰決之一日。何況現在物價又微有波動，如不即早防止，可能使整個社會餘資重行衝向物資爭購一途，使已漸安定之人心，又趨浮動，結果功虧一簣。

自然政府也曾考慮到這一點，所以最近報紙登載，有發行金元公債之議。此公債之目的，與其說他是彌補預算赤字，不如說他是吸收餘資，使金元回籠，減少通貨流通數量。真是如此動機，固無可非議，但是其成效是很小的，小得對於自己目的之達到無所幫助。其理由是：第一，以前法幣公債正在收兌，人民痛定思痛，難免將以往慘痛經驗與金元公債相連繫，因而對於金元公債之推銷，發生窒礙，尤其是在物價尚未完全穩定的時候，以貨幣單位計算之債券，推行尤難；第二，根據以往公債募集之經驗，大都以銀行莊及大戶爲銷納之對象，勸家門巨富出錢，有如叫「駱駝穿過針的眼」，最近救濟特捐即爲一例，再加上富人們都有前項所說的經驗，勢必想盡種種方法規避，所以公債發行的結果是很難樂觀的。

我們要知道有錢人——尤其是豪門究竟是極

少數，中國的富者要是很多的話，倒是很可慶幸的。少數富豪即使能慷慨解囊，也不見得能救國家之窮，何況這簡直是與虎謀皮。一個不能實行之主張等於無主張，這又是我在討論時事問題時與許多朋友們意見不盡相同之一點。假使吸收餘資發生很大作用，必須使一般人能自動的自費的拿出其餘資來，讓政府吸收纔行。目前需要政府爲人民建立一種穩定的儲蓄工具，這是目前唯一而迫切的需要，也是幣制改革後亟需採取的第二步驟。

政府如能立刻建立一種穩定的儲蓄工具，人民手中的餘資，可以立刻回籠，而首先回籠的是一些非職業的投機家手中的餘資。一個普通人民或家庭主婦，爲着防預將來物價上漲而在普通的購買習慣以外多購存二三袋洋麵，或爲防止幣值之跌落而購存幾個袁大頭，在經濟的意義上都是非職業的投機家，其心可憫，其情可憫，而其行爲之後果，因人數特多，對於物價影響之大，遠非社會所注目之大囤積者所能比擬。政府若真繩之以法，不特於心不忍，且那來備大監獄去收容，又那來許多囚糧去供養。「遊資」作祟，這纔是其爲害最烈之一部份。假使有方法能使這部份餘資先回籠，物價穩定可以解決過半矣。這些人既非有意投機，倘有穩定儲蓄工具，何苦終日奔波市場，其能自動將餘資被政府吸收，殆無疑問。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幣制改革之效力，只能使物價安定三數個月，使政府得一喘息之機會，而此所謂安定，係指使物價上漲，或降低，並非使物價穩定不動。且在此段時期內，亟應馬上等

謀第二步辦法，否則機會稍縱即逝，真能推行一種穩定之儲蓄工具，物價從此可以更形穩定，而逐漸入於正常狀態。自然要國家經濟恢復正常狀態，尚有待於許多政治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條件之具備，就在恢復了正常狀態以後，仍可能有許多經濟問題發生。可是在解決目前通貨膨脹經濟問題大前提下，第一步之貨幣改革已經推行，則第二步為人民樹立一種穩定的儲蓄工具，也是非常迫切而必要的，其重要性決不下幣制改革之本身，這一點是我們要提請執政當局特別注意的。

#### 四、物價指數儲蓄證券

前面所謂穩定的儲蓄工具，具體的說，就是數月前國內一部份經濟學者們所主張的物價指數儲蓄證券。這裏我得先聲明，我在數月以前，當蔣碩傑李崇淮諸先生等提出物價指數儲蓄證券之論時，我是持反對意見的一人，并在上海經濟評論上與蔣先生反覆辯論。現在我也主張物價指數儲蓄證券，是不是放棄了從前反對主張？不是的，在從前那種客觀條件之下我反對，在現在客觀條件之下我贊成，這是不矛盾的。譬如以少量之水救沖天烈燄，不特無補於事，實足以助火之感。如以同量之水救星星之火，則水到火滅，非水有不同，乃客觀條件有強弱之分耳。

我從前為甚麼反對物價指數儲蓄證券呢？我現在把所持理由簡述如下：因為促使物價上漲之因素多而且強，單靠一種穩定的儲蓄工具，力量太小，不足以收平抑物價之效有時相反的還保障了投機家之投機利益。因為某種投機性物品之物價上漲率大於物價指數，則持有證券人競向中央

銀行兌取現金強購此物品，如投機性物品價格小於物價指數時，則投機家拋售貨物購進證券，是保障了投機者最低限度之利益而無補於物價之穩定。當時富於投機性物品如黃金美鈔充斥市面，證券交易所仍在開拍，此外重要日用必需品如食糧亦為優良之投機標的物，這些用品之自由市場存在，前述困難不能免避。

在技術上因各地物價水準差異太大，如全國採用同一指數，各地不得其平，各地物品與證券之間之購進與售出頻繁，更足以助長物價之不安定。如各地各有其不同之指數，難免發生各地區間之類似套匯作用，使資金流動飄忽無常，物價仍不能安定。此外在人心極度不安定情況之下，亦非專靠一穩定之儲蓄工具能將一切經濟問題解決。

自從幣制改革以後，客觀環境為之一變，樹端浮動之人心，已暫時趨於安定，在心理上有一較前此良好之基礎，黃金美鈔亦由中央銀行收兌，交易所明令停業，重要投機標的物及其場所，失其依據。各大都市食糧由中美合作配售，苟能運用得宜，糧價不難穩定，最低限度亦不會因糧源缺乏而釀成狂漲。尤其重要的是，幣制改革結果，各地物價水準漸趨一致，在技術上減少了不少的困難。在幣制改革以前，許多足以妨害物價指數儲蓄證券的客觀條件，現在均因幣制改革而不存在或大為減輕，同時還有些有利的條件產生。第一如照我們第二段之預測，在三數月內，物價波動每月在百分之二十以內的話，非職業的投機家的投機意向必大為降低，蓋物價上漲率既在百分之二十以內，除黃金美鈔而外，大多

數物品之保存費用 (carrying cost) 均不甚小，出手亦頗不易，獲利既未可必，何必干冒囤積罪名。且以物價波動不大，市場利率必然降低，地下銀行勢不能大為吸收存款，非職業的投機家手中餘資，當以購買儲蓄證券為妥當。我們在第三段裏又已經說明，目前一般人心目中的問題為兌換來金圓券後怎麼辦，就是說他們正迫切的需要一種穩定儲蓄工具，如能在此時舉辦物價指數儲蓄證券，可能水到成渠，一拍即合。

可是在技術方面我還要補充一點意見，這許是從前主張物價指數證券諸先生所未提到的，而我認為這一點特別重要。儲蓄證券除照諸先生主張按照一定指數由中央銀行兌取外，并應准許其有自由市場價格，就是說證券持有人可以以高於或低於指數之價格向自由市場出售，這樣可以增加證券之流動偏好，更易使人民接受。因為指數調整有一定期限，不及市場價格變動之敏捷，調整時間距離太短，技術上有困難，太長不足以適應劇急變動之物價情況。並且准許自由買賣還有一個好處，即可以不至於增加現金流通數量，因甲售與乙，和甲直接向中央銀行兌換者，在社會現金流通數量上大不相同也。

總之物價指數證券之推行，在幣制改革以後為刻不容緩之第二步驟，因為幣制改革祇有短期之效力，如不能即時舉辦，恐前功盡棄，平衡預算平衡國際收支諸端，固為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之要圖，但時間上尚可稍延時日，在現階段中，舉辦物價指數儲蓄證券，似乎是唯一能安定物價之神藥也。

九月八日



# 晉中平靜無戰事 (太原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粉水靜靜的流着，太原周邊最近並沒有大的戰事，工廠在冒着濃煙的起落，運來糧彈和必需品，運走想離開這裏生活不下去的人們。雖則這座晉中的孤城向東南西南三面控制地區僅二十里，向北也不過五十里，但是戰爭的威脅似乎並不見得多麼大，因為城裏的一切比較兩個月以前並沒有多大區別。老百姓的去意早就關了門了，剩下的公家的合作社還在照常營業。食糧是不再配售了，每天只配售一點日用品和食鹽。

山西的平民經濟實施到現在已經完全失敗了，但這失敗的苦果是平民必咽下去的。另一方面政府在平民經濟的實施中算是大大的成功了，那成功的甘果早已拿去充實山西工礦。這筆帳到現在是無法計算的，老百姓是啞子吃黃蓮，有口說不出；當局也不會得了便宜賣乖，再說起過去的事，他們更願人民將平民經濟的那件事忘却，或者乾脆按「原法幣」的規定價錢退股。

「原法幣」一詞，當平民經濟開始實施時，在太原市場上相當的流行，現在法幣改成了金圓，戰火燒遍了晉中，平民經濟政策早已束之高閣，所以「原法幣」也就無從無影的來到人間；又不響不響的返歸天堂。「原法幣」是一種什麼玩意呢？當局解釋為一種沒有發行沒有票面的幣制。在平民經濟開始實施時，以原法幣向合作

社入股，一元原法幣等於現法幣十萬零七千一百四十三元。他的所以如此折算是因為抗戰前三號布一匹值法幣七元，而當平民經濟實施時，三號布一匹值法幣七十五萬元，以七除七十五萬得出如上之折算法數。每人入股原法幣六元，可以取得合作社員資格，按吃飯的等級領取配售食糧。當時的配售價僅當黑市價五分之一，把黑市提得高高的，使得老百姓不得不竭盡所能為全家或一部人入股。如此人民的錢為入股都集中到政府的平執會手中去。然後用合作社的股金運用到發展工礦和到省外購買東西上去。有人估計當時山西工礦的復工還是受了平民經濟的實施的恩惠。

配售糧食從那裏來的呢？平執會的人說是集資向外採購，而有意中傷的人却指着那吃着不順口的高粱麵說，「我們吃的高粱麵，是副主席從日本手裏接收來的馬料，再儲存下去就要發霉糟塌了，所以發出配給我們吃。」這話是有點冤枉了團先。可憐的糧食來源還是在四縣各縣徵集來的。因為在兵農合一政策之下的每份地要擔負田賦小麥一石，馬料二斗，縣村公糧二斗五升，優待糧花小麥三石，棉花五斤，還有地租按原地租額正額徵一。此外還有所謂調劑糧，救濟糧，更有所謂突擊徵糧，繳不出糧的人用鍋碗瓢勺，破衣爛被，木料草草都可以繳價出代糧。總之，配售糧是用四縣無價徵得的糧食，到太原城裏配售，而將原法幣的股金集中到政府手中拿去運用。這無本的生意，苦了數收年景中的四縣百姓。鄉民以樹皮、草根果腹，把糧繳出到城裏去配售。如此理應城裏人受到大惠而感激涕零了，事實却又不

然，配價原為黑市五分之一，後來一天天的隨着黑市增高，不是按比例的增高，而是超比例的增高。開始是半月一次調整配價，後來是十天，再後來是五天，最後是一天一個價，而且日益接近黑市，到大家不願再領配售食糧時，配售工作也就無形中止了。目前願意從合作社退股的，可以將六元原法幣，折合為四百萬元法幣拿回去，而高粱麵每一斤一百四十五萬元，誰又會將股子退出去換兩三斤高粱麵呢？政府不提了，人民也不問了，「原法幣」已經成了山西平民經濟史上的歷史名詞。

做沒有本錢的生意，貴能空中取水，地下淘金。而且可以用買醋的錢先去買油，緩急先後轉手之間，在物價飛漲，供求失調中也有大利可圖。山西工礦從省外購買必要的材料，是不愁沒有錢的。陸上對外交通雖斷，只要空中有幾架飛機飛往，山西工礦就不會空虛。陳納德是山西的上賓，民航隊除對山西幫了不少的忙，當然他也撈得了一批可觀的運費。

太原公教人員的薪水，每月多是分幾次發出，很少一次發完。按指數計算發薪的幾個月，太原是指數最高的地方，但是地方當局要劃一文武待遇（因為武職部隊人員全國以京滬區為準），於是公教人員的薪水，無形中就打了折扣。而武職人員也沒有提高，還是用養廉費一類的東西來維持着。什麼是養廉費呢？那就是公開的規定的吃空額。一部分管糧也來自空額，當然還有大部分的吃空額集中着。集中着的空額由誰來吃呢？那就不必問了。假如再認真地問，那他可以告訴您又是用去維持山西的民營的工礦去了——山西的工礦都

是民營，並沒有省營國營的說法。山西原來可以領X X萬人的薪餉，晉中如縣失去時，部隊的損失也非常可觀，據估計損失的人數約有三分之二，我們的主任兼主席還是照舊向中央要那末多的餉，他說損失的部隊，早用民營軍把他補上了。楊愛源副主任兩次飛京不僅是為了請援，主要的還在索餉要糧。

晉中如縣的失守的迅速，是出乎一般人想象的。親訓師遭受伏擊，就算是偶然吧，而趙承毅總司令率領着四五個師，為什麼還衝不出來呢？以X X人為骨幹的第十總隊，為搶救趙總司令死傷更大。天天喊肅清偽裝，結果連吃了大偽裝的虧。在每個「鐵班」的組成中，每一個人都要定兩個為「考慮」的對象，互相監視，結果互相猜疑，自信既無，共信不立，使得「鐵班」有名無實，鐵軍無從建立。重砲團長曹利鋒是兼主席面前最紅的人物，太原市上傳說着趙總司令衝不出來，就是曹利鋒放炮搞的，他們向那裏衝，那裏就有敵人，衝到前後彈盡糧絕，兵員失散殆盡時，曹利鋒將趙推上汽車，掏出手槍就扼他脖子去了。

第十總隊再也不要來吃大米白麵了，再也不要來用現大洋關餉了，更不要來娶妻安家立業了，他們有的已經死去，有的少數被俘，剩下的一都人每天吵着鬧家。從本月十五日起，太原將三千名左右的日僑空運北平，轉津揚輪，遣送回國。他們投降後又在中國駐了三年，在中國戰場中駐了三年，固然看到了我們某些地方的不具進，却也未始沒有看到人民的覺醒與力量。他們已經真正的失去戰意與戰力

他們投降後又在中國駐了三年，在中國戰場中駐了三年，固然看到了我們某些地方的不具進，却也未始沒有看到人民的覺醒與力量。他們已經真正的失去戰意與戰力

面回國了，這現實的教育，對他們也不見得沒有好處，所怕的是他們回國後見到日本的「復興」，再燃起侵略的慾望；不過現在他們是要真正的降伏下旗回國了，沮喪的一臉橫肉，個個面面相覷，心境愉快而實迷惘。

太原民心安定，近來偶然聽一兩聲城外的砲聲，也都習以為常，大家心裏想，橫豎就是那末回事。既無形消滅了，不

## 從南京到東京 (南京通訊)

### 多事之秋

從莫干山到姑蘇，蔣總統八一下了廬山，那一天我在通訊的結句中說：「一個經濟上的改變，只要在美國同意之下，幣制可能有極大的變動，但政治上的動亂，其具體延長的程度，則有待於張軍的訪日歸來而定了。」

經濟是政治的延長，「八一九」的經濟方案實施以來所發生的問題，那要由經濟觀察家去研討，此地暫作保留，而且認為真正的出路不在我們內部的一切，還是要看張軍此行的收穫，如果是美式的一大東共集團「復活」了，經濟上有了新出路，那時政治上的若干行動，也就有了新的指

標。

華中連日在噴嚏戰，在近日以來，中央也同在作總體戰，陳立夫到美國，對於大選後的新形勢作一些準備，張軍的到日本，對於東方的未來，與「夢皇」交換意見，同時為自己找出路。甚至於這次對蘇聯也不偏枯，還派了一位司令卜道明很禮貌地，到莫斯科走一遭。

全世界看，今年是個多事之秋，從中國看，這也是個多事之秋。三十多年的內戰爭夾攻中，中國人民如大樹一樣地遭

能坐飛機走的人們，似乎也不太着急，他們也無心顧到合作社裏去退股，一種天塌砸來人的心理迷漫着。省府又要大裁員，準備把一批年老體弱的人員，和大批死難後存人員的眷屬，送往綏西去開墾，人數在兩萬人左右。這這幾位既成問題，而塞外毛荒，使他們有老大難的悲哀。他們心裏喃喃的吟着「同生死，共什麼」的入會誓詞，有說不出的悲憤。

受了這種磨傷，但同時在皮下却也到處萌發了新芽。如一位自由主義者所說「苦撐待變，以戰求和」，這是很有深意的兩句話。

### 從南京到東京

東南亞風雲緊急，「八一五」，李承晚在夢皇監視下登台，莫斯科的會議有意無意地牽涉到東方，於是在新經濟方案頒布後的第二天，八月二十一日，張軍夫婦偕「駐韓特使」邵毓麟，飛到了羽田機場，展開了「私人的訪問」。

張軍從美國歸來時，曾路過日本，停留三天，這一次却作近三週的旅行。張軍這個政治集團一向是對日本有深切關係的，任何人都推論此行必有政治與經濟的雙重任務。因為張軍氏在赴日之前，他曾代表着一個使命到華北、西南，分別作過「私人的訪問」，途中而且道經了香港。只有他的「分兩」，到日本去才有意義。

中日關係應當怎樣呢，「七七」前三個月，那時行政院蔣院長在中日貿易協會在京成立席上，那時的一些話頗可追叙，他說：

「我們東方人，始終不能離開東方的文化，猶如那邦永遠是那邦一樣，地理和

共軍最近不一定會積極進攻太原，太原城中傳說，徐向前曾在太原對共軍講話說：「我們用不到去急攻太原，就是攻佔了太原，那裏的工礦勢必被砲火和飛機轟毀，對國家是極大的損失，現在太原工礦繼續閉工，對咱們是有好處的，關軍會做咱們的護送隊。」不是嗎，在榆次太原徐濟三角地區國軍遺失的武器彈藥，據說就可裝備兩個縱隊的共軍。因此太原近郊

歷史都是不可移易的，東方民族如果沒有東方文化作基礎，則永遠不能和其他民族相維而共存。東方文化的特點，在仁義與道德，東方國家重禮義，所以稱為禮義之邦。本人少年時代在日本留學，即十分企慕日本建國的成就，即在於這一點。以後立志革命，也就是要恢復敵國的固有精神地位，為發揚東方文化而努力。」

「還記得兄弟在民國十七年旅居日本時候，曾見了日本實業界泰斗，禮澤子爵，子爵親自送給我自已特別校印的一部論語，特別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句話，說他生平最服膺這兩句話，並且時常提示給日本的青年，認為這是我們東方精神的起點，同時很親切地告訴兄弟，希望以努力發揚東方文化相共勉。可惜子爵已經去世，但他的話，使我留著很深的感謝與回憶……」（三月十六日在京招待日本經濟考察團致辭）

這也許就是到勝利後「對日寬大」的基本精神，也許就是今日日本方面在喊「援助中國」的張本。

### 原子彈與東方政治家

張軍到日本去的時候，外籍記者的電

最近還可能繼續平靜下去，太原人民還得忍受高物價的折磨。糧食是個嚴重問題，麥收時為了搶麥兵力分散，各縣糧失，現在大秋又到了，冀島上的國軍，是否還敢再向外搶糧呢？由於糧食的缺乏，圍城中的大同守軍中止運兵。太原依然是要守糧，並不要兵。

徐向前留下足夠的兵力看住平靜的太原，賀龍可能以晉、陝、甘、寧聯防司令名義，在秋季發動驅逐北綏南的攻勢。

### 本刊特約記者

報中一再指出其中有東亞共同盟及中日韓合作的可能，均由中央社一一否認。而「夢皇」特別在星期日招待這位上賓，似乎也是一種迫切期待中的現象。

一本社記者對於外國報紙，「中央社東京記者說，「所傳有關張氏的各種傳說，雖然未予以證實，但可確言者，即張氏訪日所予日本全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轉變，對於中日今後關係，乃至整個遠東局勢，必將發生極大影響。」

官方認為張氏來日後之一言一動，不僅引起參帥及盟總高級官員乃至東京外交團方面之極端重視，事實上，且予日本朝野及各地日人以極大衝動。他在各地一再提出「日本必須實行思想革命與心理建設，向民主政治邁進」，獲得日本全國輿論的接受，甚且進而躍躍為一種運動。這就是說中國要與日本同樣將接受美式民主，在形式上，用這種共同的運動而結合為同盟。

若干盟總官員「亦表贊美與贊揚」認為是只知被動的服從，而未作到自發地前進，此實待於融合熱情與理智的政治家之精神領導。日政界某權威人士稱，「原子彈對廣島轟炸，使日本軍閥屈服於盟國戰爭武力，蔣主席八一四對日聲明，使日本



國民拜服於中國的偉大精神之下，而此次張軍要求日本國民實行思想改革與心理建設，則又與上述所提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指令不同，而為一種東方政治家的積極的精神的領導。一日人為之再起，不惜以臣妾之道事奉皇，假如真是這說，那又是以同樣的聲言也。在一援助中國，而事實上，却還是為了他們軍備及武裝的再建。

張軍氏不能不說是一個好演員，一在「中日文化協會」，以寬猛相濟之語調指責日本軍閥，並請日人實行思想革命，心理建設，以使和平民主日本之實現，而使出席日人感激下淚。：：：東京，廣島，大阪，神戶，京都，奈良各地各界日人領袖，踴躍求見張氏之擁擠與過求教的真情，尤以張氏在廣島所說，「廣島雖不幸為終結戰爭之終點，但願廣島更為和平日本的起點」，以及呼籲廣島華僑代表協同日人建設民主日本之訓示，使中日人士及在場盟國官員，均為所動；記者在大阪更親見張氏接見日本經濟界領袖時，痛責過去日本對華經濟政策，指出今後日本必須徹底實行政治民主化，始能期待中國乃至其他國家的諒解與援助，而使日人衷心接受；：：：在琵琶湖作短時修養時，尚有當地日人，地方長官前來謝罪求教；：：：張氏書桌上，滿堆各地日本民衆所送之致敬與悔悟函件；：：：

在原子彈與東方政治家之下，日本官民高呼「我知罪了」，既是一放下屠刀的一屠夫，且一立地成佛，何況兄弟之邦，當然攜手已在不遠了。

### 日本工業的力量

中國在三年前獲得勝利以後，本以為接收了東北及台灣的工廠設備可使工業技術進步一百年，但這個機會錯過了，我國的工業並沒有進步，反而向倒退的方向去走。反觀日本的工業却在安定的環境中，

恢復了大部。而日人也就有了自信的本錢。

據日本金剛鑽雜誌稱：日本工業生產能力在投降時曾降至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水準百分之十，現已約達該水準之半。該文指出現有工廠及工人數目均達戰後最高額，約共有工廠十一萬家，工人三百六十萬名。

經過精密檢討之後，該刊得到一個結論，即生產量並未與工廠及工人數目成比例增加。此種離奇局勢乃由於工作效率的降低，適當設備與資金之缺乏，及因管制經濟而生之從事延遲的官僚習氣所造成。戰後工廠的分佈與戰前已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已由大阪移到東京，這樣以來，原來的工業區的工廠數字大為減少，而本有很少工廠的地方至此則大為加多。

還有一個特別的現象特別值得注意的，也就是次等生產工業的發達，如木器，印刷等工業的增加比率，在戰事結束後幾乎比較前多了一倍，這也是以表示消費能力的增加，與人民單位生產力的恢復也大有關係，民主也因此被粉飾了出來。

據該刊去年全年各類工廠數字為：金屬工廠一〇一六七家，機器零件廠二二七四七家，化學工廠八一二七家，煤氣及電廠九二五家，陶器廠五六一三家，紡織工廠一五六九九家，木材及木器工廠一二四二二家，食品工廠一三三六三家，印刷及裝釘工廠二二一四家，其他工廠六四五四家，去年生產總額估計為三千億。(日圓)

最後該刊並指出僱用工人在五十名以下的工廠佔總數百分之八十九，而佔總數百分之十的大工廠內，所僱用的工人約佔全日本工人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三。從上面看，日本保留下的工業的重點在那裏，及工作的對象都可以看出來，我們重新領導以弱羊與猛虎為友嗎？

### 中日能貿易嗎？

中日貿易能恢復嗎？有人看到海南島的鐵，長蘆的鹽，台灣的糖，以及開採的煤，都在陸續輸出，以換取外匯，(或實用物資)及日貨在華南大量的泛濫着，便認為中日貿易已在恢復了，這還是一種太天真的看法，據中國官方中央社所發表的消息是：「中日貿易短期間難望開展。」

在中日未恢復邦交之前，只有一個單位可以和日本有交易行為的，那就是中央信託局，而二年多以來，這僅有的機構在對日本貿易上就欠了日本貿易總一千萬美元，無法償還。為什麼有這樣的現象呢？一位過去作過駐日代表團團員某氏說：

「中信局係以低廉的官價，收購出口易貨的物品，並按官價外匯折付價款，致使若干有貨輸出的機構，不願出售貨品，迄今無法清償所欠日本的債務。」

這位熟悉情況的人士又說，海南島鐵礦沙二十五萬噸及大冶鐵礦沙二十萬噸，皆係售交英商轉售日本者，此乃因英商不備出價較高，而且能直接付出了外匯的原故，由於中信局的這種政策，乃使中日貿易前途渺茫，赴日本的私人貿易代表也在寫信給國內說：

「一事無成。」

據華商經建最大的基地台灣消息：「一台灣在一千萬美元中所欠者佔二十分之一，即約合美金五十萬元。計中信局前代台灣自日本購運台省鐵路局所需的火車頭五輛，價值美金三十四萬餘元，台省農林處所需的種子一批，價值美金二萬餘元，運台交貨已一年有餘，而台省迄未償還相當的易貨產品或現款。嗣後又自日本運來台灣的鋼綑布，台灣電力公司所購的電磁子及鐵路局所購的機車配件，其價共值美金十餘萬，亦因台省未付款而堆存高雄未能交貨。」

幣制比較穩定而有大貨物出口，台灣物資調節委員會且如此，其他內地，當然更可想見。中國出口數字是跌落的，還機只有使中央信託局早晚喪失了控制的權力。

對日貿易，缺少良好的配合，如果認為立即開始，怕為期尚早，決不會因為張軍之行，便有根本改變，但無疑的他們要談到這個問題。

而四強之一，竟是戰敗國的債戶，設有人看到東方政治家對這一點來說些什麼？

### 收穫是什麼？

張軍就要回來了，他在去的時候說道：「此行將以私人資格赴日，但在日如有見聞於返國後自當貢獻政府參考。」又說：

「韓國之行將於日後決定，至今後有無其他旅行計畫，目前尚未考慮。」

「不論從那個角度看，張軍一定有其收穫的，最簡單的一件事就是中國與日本的交通路線打開了，下文可以為證：」

中央社東京二十六日專電，盟總所特許之中國公司，又有二家即將在日本開幕，致中國在日進行業務之團體，不久將有三家。即將在日進行業務之二公司，一為中國銀行東京分行，定九月一日正式開幕，一為招商局日本分局，亦將於下月初開業。據悉：各分局與分行建立權屬之原因，在於尋找辦公地址，極感困難。按目前經盟總批准在日工作之中國機關，僅有中央社東京分社一家，中國航空公司雖已獲盟總核准，但尚未在此進行業務。雖然這是一個開端，但更多都是從極少來開端的。(八日)

# 河西——農民的地獄 (山丹通訊)

谷苞

離開了蘭州，沿甘新公路向西走出一百多公里，斷續的長城和殘存的左公柳，對於一個旅行者除了憑添荒涼的感覺外，又怎能不觸動一些歷史上的回憶。如果這個旅行者沉湎於漢唐的盛局而自我陶醉，自然他可以帶着一幅懸吊、古老，甚或是獵奇的心情，滿意的完成他的旅程，可是當一個有心的旅行者把目光放在了現實生活上而時，眼前活生生的悲劇，將會使他寒而慄。

森林的開伐造成了水利的損壞，政局的動盪又造成了一兵匪一的禍亂，二三十年來生活在河西的農民，早沒有了天日。常言說：一水往低處流，人向活處跑。一十幾年前當他們無法在家鄉自容時，都相率拋棄了田舍四出逃亡。那時候田地是一種累贅，人們都在慷慨的贈送者，但是却無人敢於接受。今天，從永登縣城沿着公路往西走，途中還可以看到無數荒蕪了的田畝，和當日那批逃亡者所遺留下來的房舍。從永昌縣城到山丹縣城中間一百零四公里，景象更為慘慘，除了幾處零星的村落外，中間幾乎全是斷絕人煙的曠野，在大片的熱荒裏點綴着人去屋空的廬舍。到今天演了二三十年的這幕悲劇，並沒有落幕，看樣子還要演下去，真太慘了。

有着一百三十多戶人家。在今年舊曆五月間青黃不接的時候，能够吃飽肚子的人家才不過十一二戶，其餘的大多數人家靠着少量的穀物和大量的野草，吊着一口斷不了氣的命。雖然精壯的小伙被飢餓磨得四肢無力，然而還算好他們畢竟沒有像別村餓死了大量的人。他們衣着的可憐使得有破襖衣或獸衣穿的人家已經稱之為不錯，在夏季裏赤着上身，冬季裏沒有衣服冷得足不能出戶的成年人，真可算是少數中的少數。我說沒有褲子穿，並不像獵奇的旅行家們，把它當做一種笑料，炫式自己的見聞。也無意板起面孔橫起心來把它和所謂道德與民風連在一起，在我看來這一切都是從窮字上生根。這樣一種缺乏衣食的生活，也還不能算是最壞的情形。到了家中的食糧顆粒無存，而又告貸無門時，小孩子算是唯一可以出賣的財產，今年夏天永昌山丹民衆等數縣賣孩子的農民非常之多，在這個商業蕭條的社會裏，人口的販賣算是本年度一種生意興隆的買賣，人同此心，這裏做父母者的心腸不會與別的地方兩樣，賣孩子何嘗又不是從窮字上生根。

窮，不錯的，然而窮根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哩！是由於政局的動盪吧？不錯的，是由於水利的損壞吧？也是不錯的。然而除開了這些不談，還有一條貧窮的主根，這條主根便是猖獗的高利貸。說者常喜歡把河西農家的生活形容為一般的貧困，這只能算是一種皮相而錯誤的看法。持這種論調的人，他們的論據是在河西土地的分配並不集中，以土地作為剝削的關係，也不存在。這話在表面看起來是不錯的，由於土地報酬的低微，在一個農家所能經營

的土地上，養活了佃農，便不能再有剩餘去養活地主，因而以土地作為剝削工作的租佃關係，自然不太佔重要的地位，然而租佃剝削的不太重要，並不就等於剝削關係的不存在。在河西剝削的重要工具是高利貸，靠了高利貸，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貧農的困苦上，建築起了不到百分之十富農的富裕。因而河西農民生活的窮迫是實在的，富有仍然屬於少數人。

說起河西的高利貸來，它和河西的歷史一樣的著名。這裏我願對河西的高利貸做一簡略的說明，高利貸的形式重要者大概有五種：一為借糧，二為支糧，三為支工，四為合種，五為剪毛。所謂借糧便是指着貧苦農家在春種或青黃不接的時候，向富農處借貸籽種與食糧，二、三、四日借出，八、九、十日歸還，利率分為兩種，一為一加五，一為一對斗子，一加五一是春借一斗，秋還二斗。一對斗子一是春借一斗，秋還二斗。有田產信譽的人才能借得出糧，它在各種高利貸中利息最輕，還算是屬於上乘。所謂支糧，是指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富農以極低的代價預備購了貧農的秋收。在今年五月間，此間一老斗（約三市斗）小麥的市價為三百萬元，而支糧的價格普通却為七十萬元。換言之在這種時候貧農用之富農的七十萬元，在富農處僅購到了二升之小麥，在秋收後便要還富農小麥一斗。本利是原本的四、三倍。所謂支工便是指貧農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向富農預支秋收的工資，普通秋收的工資為三升小麥，而在支工時最多却能得到上數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即小麥一斤至半斤。所謂合種，是指着貧農將自己耕種過的田地，無籽種撒下時，

請由富農播種，播種後田中勞作由雙方負責，待秋收後，除種籽本息以加五或對斗子歸還富農外，餘糧由雙方平分，田賦與捐稅都由貧農負擔。最後所謂剪毛，是指着貧農無力償債時，將自己的田地交由富農播種剪毛，剪毛又分為活剪與死剪二種，活剪是秋收後如不足所欠債額數目時，差額仍由貧農補還，如有餘時，在理論上自然亦可退還貧農。死剪則不論秋收後收成的多寡，一概歸於富農，債務亦可一次清理。

高利貸通過了這種種的形式，在贖人聽聞的利息下，富與貧，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有着清楚的分野。富有者靠了大量的耕地，介荒的無形獨佔了放牧與種養，以及高利貸的盤剝，脫離了勞作過着富而無閒的生活，知識和教育自然容易得他們服務，自然他們也容易顯得有見識，容易接交官府了。這樣子在鄉村社會裏，有錢也有勢，錢與勢又會互強勢。貧農終歲勞苦，豐年裏缺衣之食，老年裏便不免出賣妻女。他們沒有餘閑，也沒有知識，受苦是所謂的命。高利貸對他們是一個填不滿的黑洞，還不完的債。年年少不了還債，還債常是借債的原因，於是年年又少不了再借債。在河西有兩句俗話：一句是：「住了孩子（打場用），賣了驢子（裝糧用）」另一句是：「一頭不怕，虎不怕，眼主張賊一雙斜站下。」前一一句可以說明貧農的收穫還了債便是一場空，後一句可以說明債務人對債權人的恐懼心情。債，債，似這樣還不清的債，製造了人世間無盡無止的痛苦，這樣的地方，大多數的農民在高利貸下過着這樣的生活，我不禁要喊出：「河西——農民的地獄。」

九月二日於山丹縣住奇樂

# 一個社會學者看東北

(瀋陽通信)

陳 達

我生平有些名實不符的事情，但最明顯的矛盾，要算在最近東北之行所表現的。名為講學而去，實際趁此機會，領略一番本地風光，偶爾做些粗淺的社會觀察。果然，這些事體，骨子裏並無基本的衝突，但推開天窗說亮話，人家既約我去演講，總盼望我對於東北青年有所啓示，那知我自己所得到的益處，比我給予他們的益處，多而且大。按理論說，這是矛盾；依事實講，這是名不符實。

## 時代的轉變

抗戰以前，我曾經過瀋陽兩次：民國十八年往檀香山去講學時，路過瀋陽，但逗留的時間不長。民國二十五年赴歐旅行時，亦由北平取道東北經西北利亞。此番舊地重遊，未免引起了一連串的思想。以前來時，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鼎盛時期。目下再來，悲喜交并的局面，呈現在我眼前：淪陷十四年的故土，重歸祖國，煞是可喜的事。但國共兩爭，於斯為烈，尚不知如何演變，未免使人就憂耳。

## 日人認我述作的起源

在前述轉變的時代，我已開始任教於清華（民國十二年）。正值張作霖入關，坐鎮北平（民國十四年）。我的研究工作，關於中國勞資爭議及罷工的材料，業已整理就緒，擬在北平南河沿經濟討論處的工商半月刊發表。當地公安局檢查稿件時，認為有關治安，將其全部扣留，迄未發還。以後我的「中國勞工問題」一書內第四章的材料，是根據留下的稿件重寫的。我同時依照罷工的資料，作一英文的總結，在美國的勞工統計局的勞工月刊披

露（一九二六年十月號）。某日大阪原社會問題研究所所長高野君博士借北平滿鐵事務所研究員宮本通治君，到我的書房談話，見我近八年來國內罷工的分析（清華學報，三卷一期，民國十五年六月）一文，囑宮本譯成日文，結果滿鐵北京公所研究室，作為滿鐵月報特刊第十三種，於昭和二年（一九二七）五月十五日刊行。從此以後，日人偶爾譯我的述作。某日東岩松堂書店有人到我家中，商談譯「中國勞工問題」一書，我手頭剛有勞工月刊數冊，內中有「內亂期間的勞工狀況」一文（一九三〇年七月號），後亦見有日文譯本。不料譯者藉此鋪張中國的內亂，對於勞工情形輕描淡寫，簡略譯出，驕視之，成為敘述內亂的文字，實是斷章取義歪曲事實的明顯例子。

當抗戰初期，我在昆明曾接北平友人信，報告「南洋華僑與國事社會」的日文譯本，但余從未見其書。此次在瀋市，余趁閒往交通部鐵路圖書館（戰前為南滿鐵路圖書館），經運貨海協的協助，得閱日文譯本。知由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出版，作為南洋華僑叢書第六卷，由中島宗一執筆於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九月二十日印行。此外，我在鐵路圖書館，找出些他處未曾見到的書籍與資料，這是南滿鐵路以前所搜集的，例如關東局的國勢調查統計表，人口動態統計及勞動調查結果表；加藤常賢的支那古代家族制度之研究；滿鐵調查課的中國秘密社會史；華工大苦力頭制度；滿鐵勞工協會的滿州勞動年鑑（康德七年）滿鐵撫順的滿人勞動者的體力檢查；井出季和太郎的南洋與華僑等。

## 珍貴的舊文獻

## 東陵與北陵

離瀋市東約二十里，為東陵所在地，

記得有些日本學者，喜歡用「國寶」來描寫稀有的典章文物。假如我輩做他們的習俗，我對於瀋陽所見的有些舊文獻真可當國寶之名而無愧。首先應該敘述四庫全書：清乾隆時，皇帝接受安徽學政朱筠的建議，開館校書，於十年之內（乾隆三十七至四十七年即一七七一至一七八一年）共繕全書四份，分貯於圓明園之文源，大同之文源，熱河之文津，奉天之文溯。此後復抄三部，於乾隆五十三年成書，分藏於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鎮江金山寺之文宗，杭州西湖行宮之文瀾。他處所藏之書有散失或殘缺者，獨文瀾閣之書至今完整。文瀾閣建於乾隆四十八年，當民國三年，段芝貴督奉時，曾將全書移至北平故宮之保和殿。民國十四年，奉天教育會會長等將全書運還。康德二年另建新書庫於文瀾閣之旁，用鋼書架及鐵門窗以策安全。全書四部合計，共三，五九〇種，七九，八九七卷，三六，二二六冊，六，一三九函，二，三〇六，三六五葉，為全世界種類最多篇幅最繁的書。

文瀾閣有匾額，漢文在右，滿文在左，運與瀋陽他處所見的碑文尊滿漢者有別。在文瀾閣內，同時看到「玉牒」即清朝皇室的家譜，亦手抄本，黃色綾面。前清有人見玉牒到來，必跪而迎之。一日周之風圖書館長，伴芝生與余參觀市立圖書館。此館在前清時稱高麗館，為高麗人進貢時居住之所。內藏李朝（高麗）實錄，明實錄，及清實錄，皆在日本所刊刻者。

前臨渾河，後枕天柱山。陵園寬大，樹木蒼茂，以松柏為多，清太祖之墓在焉，墓成於天聰二年（一六二八）次年將太祖及太宗生母孝慈高皇后葬於此。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大修陵園，成為今日的規模。內有「太祖高皇帝之陵」一石碑，滿文居中，蒙文在右，漢文在左。在滿洲國時期，凡到此參觀者，一般人止於前山門；若任官及以上者止於隆恩門即二門。門內為正殿即隆恩殿，平時不開門。此次守門者和我們表示好感，居然拿了鑰匙來開門。入內見有太祖及皇后神主，有寶座三及祭桌若干，分列於殿之正中及兩旁。殿後有圓形墓，墓上有樹一，枝葉甚茂。墓旁有樹，蔚然成林。

北陵在瀋陽市偏北，遠水繞其右，渾河經其左，為太宗文皇帝之陵，其石碑滿文在右，漢文在左。上端因石已分化，用鐵片圍住。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已有墓，至康熙十七年始築陵園，布置與東陵相同。石獸八件分列於兩旁樹林間。芝生云：「這些翁仲，在秦漢時就有的。」但余不解，何以石獸中列入大象，因大象不是寒冷地區的產物。我為好奇心所驅使，站立在象邊，請潘世澂君攝影以實紀念。

## 工業與勞工

前述我於民國十八年經過瀋陽時，正值我的老友澳大利亞人瑞納氏充當張作霖的顧問，我請他代向日人介紹，以便參觀鞍山及撫順。瑞納氏曰：「以政府的立場言，東三省與日本，目前不是十分友善。君既交遊若干日本學者，不如以學者的地位去接洽，比較可以圓滿些。」余雖接洽妥適，但因匆匆離瀋，未往參觀，引以為



杜甫

# 杜甫在梓州閬州

(杜甫傳裏的一章)

「世亂影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人。」(九日) 杜甫在梓州奉濟驛送走了嚴武，本想

歸。此次重遊瀋市，鞍山雖已淪陷，撫順之遊，却頗順利的如願以償，實是幸事。芝生奉還與余，某日分乘政委會的二指揮車向東駛去，於二小時內到達。道經順德瀋約九十華里，因道路失修，有些地方，顯得坎坷不平。撫順礦務局的主要工作，可以簡述如下：(1)採煤(2)化煉(3)製鋼(4)發電各項。

採煤分露天採煤與下井採煤兩種，關於露天採煤我們看到綠色頁岩，這是最上層的；其下有油母頁岩，大致用作煉油的原料，此下即爲煤層。採煤機每次可採三噸，連探兩次即可裝滿一鐵兜。採好的煤裝入鐵皮車，以鋼索通電拖拉上州，每車裝煤二十八噸。

下井採煤者目前已有三井，即華夫井，老虎台井及龍鳳井是。所費工程比較浩大，所到煤層比較更深，所採得的煤量可以較大。

化煉的主要工作，包括(A)煉焦煤(B)煉油(C)煉製副產品如染料肥料火磚水泥等。在撫順，煉油是極重要的工作，有大規模的工廠專司其事，可以煉汽油及各種工業用油。焦煤的一部即用以煉鐵製鋼。發電廠以發電爲主要任務，在日人經營時代，可發電二四〇，〇〇〇基羅瓦特。日本投降後，新機器俱爲蘇聯撤去，

目前只發電四千基羅瓦特，供本局各單位及瀋陽之用，往往是不够的。

撫順共有員工四萬餘人，連其家屬當有二十餘萬人。這些人直接或間接依靠撫順來過活。撫順最重要的產品是煤，那是東北各種實業的原動力。目前一般的勞工們雖頗忠勤，但因物價高漲，感覺生活的艱難。他們業已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盼望能夠得到適當數量的高粱米，來維持他們自己及家庭的最低生活。惟據廠方的意見，因生產量的縮減及生產成本的提高，勞工們這種要求，短期間內尙難貫徹。

瀋陽的近代工業，集中於鐵西區，位於市的西部，鐵道之西。在滿洲國時期，日人曾費盡心力，來建設若干種的工廠。待日本投降後，蘇聯作有計劃的破壞，將新機器與新的科學設備，盡量拆去，我國自接收以來，有些工廠，廢棄舊機器勉強開工。但因種種困難，目前從事生產的工廠，寥寥無幾。鐵西區一大半的工廠，現爲軍隊佔住，一般的煙筒未見冒煙。

就我們所參觀的工廠言，如兵工廠及資委會的橡膠廠等，原來的規模俱是很大的，眼前却是縮小範圍，因(一)原料缺乏，(二)生產成本提高，(三)勞工們感覺不安。

末一點似乎籠罩了東北的工業，但沒有企業家對於這個問題加以充分的注意。一般的工廠俱有考工課或人事課，但這些僅搜集並發表統計，或做些機械式的記錄工作。至於關於勞資關係，如雙方的感情及勞工們的心理等切要問題，似乎沒有人過問。

一般的勞工們，深深感覺到生活的壓迫。他們的收入遠不敷他們的生活費用。受雇者本人大概可以拿入款來維持生活，但已婚並有兒女者覺得收入太小，不能維持家庭的最低生活。豬肉每斤流通券陸拾萬圓，若以法幣計算，要乘十一倍半。最便宜的蔬菜如茄子或玉瓜每斤流通券陸萬圓。至於長春，更遭過着不可思議的經濟危機：高粱米每斤法幣一億七千萬圓，大豆每斤法幣一億圓。很少有人能以一日的所得，來買些足夠營養的食品。在這種社會環境裏，許多勞工們對於工作感覺厭倦，因此減低效率；同時因心理不安，而發生仇視經理部的情緒；對於指導員及工頭，亦隨時發生爭執。骨子裏廠方與勞方互相猜疑，構成社會不安的普遍現象。

瀋陽的西北部，近皇姑屯站的地區，是貧民集居之所。那一個個區域裏的住民，

是全市最窮而無告者。我們可以舉出一例，以括其餘。某家年三十一，一年以前喪其夫，有女二人，長者十歲，次者七歲。家結與二女住於一小屋內，屋長約十二步，寬八步。此屋之頂與壁，俱以木板爲之。木板有縫，寬者約一寸有餘。當時常賦閒，有時替人縫短褲，一日所得可換高粱米一斤(市價約流通券壹拾五萬圓)。食品中有豆餅，每斤流通券壹拾萬圓，炒而食之。據說因餅中油料太多，食後常患腹瀉。豆餅亦是主要食品之一，每斗流通券捌萬圓，加水煮食，如稀飯。筐中盛滿野菜，女孩在路旁雜草中採來，有時與豆餅共煮，摻雜混合而食。

食物不足，糞料不豐，各人面色慘白。二女孩的發育俱過份遲緩，瘦弱異常。沒有人能猜其年齡，最近似的估計，只能得着真正年齡的一半。

木屋不蔽風雨，不遮日光，但全家在這裏過活已經一年有餘。

前面描寫了瀋陽最下層社會，這裏面沉淪了成千成萬的貧民。他們永遠在飢餓線上掙扎，未死者只能生存而已，不是生活，更講不到生活程度。誰能減少他們的飢餓，改善他們的生活，誰就是救星，就是真正得人心的社會改良者。

回到浣花溪畔的江都，「寂寞養殖生」(奉濟驛重送嚴公)，不料嚴武剛離開成都，徐知道就在成都叛變了。徐知道本來是成都少尹兼侍御史，而今他却把嚴武的官銜都加在自己的身上，僞稱成都尹兼侍御史中丞劍南節度使。關於他的叛變，史籍中沒有詳細的記載，我們根據高適的賀新逆賊徐知道表和杜甫的草堂詩，知道他

從起事到被殺雖不到兩月，而成都所受的騷擾却不下於安史亂中的長安和洛陽。他趁着嚴武赴朝，成都空虛，於是北斷劍關，杜塞援軍，西取平南，擴張聲勢，沒有多久，便一籌莫展，郊原已空，市內如掃。他七月起兵，八月二十三日，被高適擊潰，隨即被他的部將李忠厚所殺。成都一疊的混亂，却仍然延續了許

久，兩年後，杜甫再回草堂，追述到當時殺戮的情形：

一闌黃三公，萬人欲爲魚，鳴和作威福，執肯辯無辜？眼前列楹楹，背後吹笙竿，談笑行殺戮，灑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惡克爾娛。(草堂)

成都再轉瞬間竟淪入一個道場難以形

馮至

容的慘境！杜甫在綿州得到這不幸的消息，想到江邊草堂和草堂中的妻子，都陷在賊中，死生莫卜，他或許會感到這是天寶十五載的再現吧。綿州不能久住，他爲了維持眼前的生活，只好到東川節度使所在地梓州。但當時東川以及山南西道，由於文官趨樂，武人跋扈，人民又不勝征役之苦，早已軍盜如毛，不復是太平世界。我們讀杜甫的苦戰行，去秋行，和後來在雲安寫的一前年渝州殺刺史一三絕句，便知道當處的劍南在這中原混亂的時代中是怎樣也不能自居例外。所以舊唐書崔暹傳中說，「寶應初，蜀中亂，山賊擁絕縣道」，杜甫獨自一人在東川的道上也不免備極擔心，路過梓州銅山縣光祿坂時，日暮昏黑，「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光祿坂行）。

這是蜀中的情形，我們再越過劍閣望一望外邊的世界。寶應元年十月官軍與回紇兵克復了東京，回紇入東京後，肆行殺掠，死者以萬計，火經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也因爲東京及鄭汴汝諸州，一皆爲賊境所逼，騷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通鑑）。次年（廣德元年）春正月史朝義殺死廣德，田承嗣李懷仙等紛紛投降，轟動一時的安史之亂才算勉強告了結東。杜甫遠在梓州，聽到官軍收河南河北，一時驚喜欲狂，脫口唱出那首驚天地動鬼神的一劍外忽傳收蜀北一的名篇，至德以來六七年胸中的鬱結好像在這八句詩裏發洩無餘。

這首詩後來不知打動過多少亂世中流亡者的心，（就是在二千一百八十二年後八月十日的夜晚，也曾被全中國的人民所歌誦，）但杜甫的狂歡只是曇花一現，沒有能够持續多久，外面混亂的局勢並沒有隨着蜀北的收復而稍爲澄清。杜甫在秦州時所憂慮的那個西戎外甥國，在先還是時而入寇，時而稍和，勢力漸漸東侵，等

到廣德元年七月，竟大舉來犯，入大震關，取郡洮岷秦成渭等州，河西隴右，全告淪陷。朝廷討賊棧道，也不能遏止，邊將告急，宦官程元振又蒙混代宗，不讓他知道。直到初冬十月，吐蕃取道涇州鄜州南下，代宗才知道大勢已去，倉遑東奔陝州，致使吐蕃一不血刃而入京師（柳伉上疏中語）。吐蕃到了長安，「剽掠府庫市里，焚園舍，具安中蕭然一空。……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通鑑）。杜甫遠道聽聞，得不到正確的消息，既苦於一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早花），又感到一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遺憂）。但長安於八年內，兩度陷落，遭受焚燬，他最爲痛心，「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類」（遺憂）廣德二年春，他在閬州才聽到收復宮闕，代宗於去年十二月回到長安，寫成排律傷春五首，這與廣德元年的有感五首，述古三首有同樣的意義，是杜甫最重要的政治詩。在傷春裏他論到朝廷應剷除小人，「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在有感裏他以爲若一新宇宙，只有行偷德，因爲盜賊也是人民；在述古中則諷當時的理財者，「權稅四出，利盡錐刀，一法令如牛毛」。他更在釋悶詩中直述政府的腐敗：「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慙慙能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睛不見風塵消。」

這時高適代嚴武領西川節度，吐蕃陷隴右，逼近長安，高適率兵臨吐蕃南境，本欲加以牽制，不料松州被圍，到十二月松維保三州和西山城戍也全被吐蕃攻陷。松州被圍時，杜甫在閬州寫驚急，王命，征夫，及西山三首，對於邊疆的危急，不勝焦愁，而悲涼激壯，成爲五律的絕唱，松州陷後，成都振動，杜甫爲閬州王使君擬論巴蜀安危表，希望減省軍用，諸色雜賦名目，能够一省之又省，因爲巴蜀人

民困於軍須，充備百役，已經到了無法應付的地步。「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征夫），這是巴蜀一片凋零的景象，所以他送陳州路使君赴任時，一再勉勵他，「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

安史之亂，亂兵本不及江南，但是當杜甫在成都時，上元元年十一月，劉展起兵宋州，橫行江淮，次年正月敗死，這時江淮的人民也嘗到戰爭的茶毒。等到杜甫流亡梓州，寶應元年八月，他的好友鄭虔所在的台州，又有袁晁之叛，陷浙東州郡，次年四月，才被李光弼討平。他在喜雨詩中也暗自祝禱，「安得報雷公，滂沱洗吳越！」

我們在這裏把這亂亂的時代作一個簡短的轉述，只爲的是同時要看出，這世界裏的一舉一動都和杜甫息息相通，具體地反映在他的詩中，甚於其他的史籍。並且他更進一步，抒發出他的「盜賊本王臣」一萬役但平均」的政治意見。我們反轉來看一看杜甫所依附的那些官吏，「劍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嚴氏溪放歌），他們的生活和杜甫的心情恰恰成爲一個對照！

綿州的杜使君打魚縱樂，梓州的韋使君率領猛士三千，從容校獵；至於隴美人女樂，泛舟江上，輕歌妙舞，燈前引得大魚都探出頭來，聽曲低昂，如有所求，更是那些縣令史們的日常生活。杜甫陪着他們狂歌痛飲，有時也感到「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陪章留後宴南樓），但他對於漫無節制的打獵校獵，無論爲了這痛苦的时代，或是爲了同情生物，都覺得是不能忍耐的。他在又觀打魚詩中說：「干戈格鬥尚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他希望韋使君冬狩時變勢浩大的陣容，他說：

「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迴轡橫西戎，草地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冬狩行）

杜甫於寶應元年（七六二）秋從綿州入梓州，晚秋時，一度回成都迎家到梓州，廣德元年（七六三）秋和廣德二年春到過兩次閬州，寶應元年十一月曾南遊射洪通泉，廣德元年春又再赴綿州，西去漢州；杜甫雖然說，「三年奔走空皮骨」，實際上他往來梓閬之間，從離成都到再回成都，不過只有一年又七個月。杜甫在這時期內，「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悲秋），「計拙無衣食，窮途仗友生」（客夜），生計完全依賴那些「邊頭公卿」。這些使君縣令，只知道杜甫能詩能文，懂得一些藥理，用到他時便「肥肉大酒」相邀，酒肉之外，並沒有愛敬的真情（見嚴氏溪放歌）。梓州爲東川節度使治所，自從成都變後，地位更爲重要，無論是人京或入蜀，成爲往來官吏的必經之地。那些地方官每每設筵迎送，杜甫也陪居末座，寫了許多陪筵和送別詩，這些詩多半是應酬之作，「淺率無味」（王嗣奭語），與前邊提到的有感，傷春諸篇，又成爲一個對照。

這正是他的最傷心處。他又事長安時一樣，自稱「賤子」，和長安時一樣，詩題中「陪」字又一再出現了。他陪着那些官吏們登山遊水，就是對於他們的奉察也得伴作親切語，說些好像不分彼此的話：「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車馬跡也無」（投簡梓州幕府兼簡章十郎官）。

他得助最多而最須小心侍奉的是梓州刺史東川留後韋華。嚴武本爲兩川節度使，被召還朝後，高適代西川節度，東川節度虛懸，廣德元年夏，才派判官韋華來



任梓州刺史兼東川留後。章彝以前，有李使君，楊使君先後守梓州，前者任期較長，後者則很短促。章彝能訓練士卒，指揮部屬，被杜甫推崇為「淮海維揚一俊人」（奉寄章十侍御），也許因為嚴武的關係，時時照顧杜甫。杜甫也就「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廳」（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陪他宴會，陪他迎送客人，陪他遊山寺，陪他打獵，廣德元年十一月，杜甫「將適吳楚」，章彝設筵餞行，他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一時，說得最為沉痛：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昆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爲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昔如蠶豶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親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

杜甫這樣小心謹慎應付章留後和他的幕僚，贏得在梓州時免於凍餒，離梓州時獲得旅資，其中含有無限的辛酸。但杜甫的吳楚之遊並沒有實現，而章彝在廣德二年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尚未成行，便被再返成都的嚴武因為「一小不副意」立即杖殺了。

時代是這樣錯綜混亂，自己的生活的又這樣可憐，這中間給他的精神一些解放，使他的內心有一些昇發之感的，是武后中宗時代的幾個挺拔不羈的人物：陳子昂，郭元振，薛稷。他奔走於梓州之間，是爲了生計，只有寶應元年的射洪通泉之遊，可以說始終是懷着一種嚮往的心情，因爲在這裏他帶了他所景仰的人物的遺跡。他在綿州送梓州李使君赴任，就想到射洪縣的陳子昂：「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爲我一潸然！」這個感遇詩的作者，無論他的人格與他的詩文，都是開元時代文化的先驅，我們在叙述杜甫的童年一時已經提到過他。他是杜甫祖父的朋友，文字宏麗，武后時一再上疏，陳辭慷慨；他雖然體弱多病，他的精神却懷然一世，爲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所推重。他於長安二年（七〇二）以四十二歲的壯年被故鄉射洪縣令段簡陷害，死在獄中，更引起後人無限的同情。杜甫在寶應元年晚秋把妻子從成都接到梓州，稍事安頓後，便去射洪縣訪陳子昂的故居。縣北涪江畔金華山玉京觀有陳子昂讀書堂遺跡，東武山下有陳子昂故宅，故宅壁上有趙彥昭郭元振的題字。陳子昂名懸日月，同遊又多英俊，一盛事會一時，此豈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陳拾遺故宅）

射洪南六十里是通泉。郭元振少年時，任通泉尉，「落拓不拘小節，常鑄錢，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內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驟徵引見，令錄舊文，乃上古劍歌，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士。」（張說郭代公行狀）隨後數上疏陳邊疆利害，佐玄宗除太平公主和她的黨羽，都能決幾應變，在杜甫眼中是一個不能以常情量度的一豪傑。如今走到他的故宅，在池館間只感到一縷魂魂如在，所歷終蕭索，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漠！」（過郭代公故宅）

至於在太學中與郭元振趙彥昭同業的薛稷，因爲與太平公主同謀，賜死萬年獄中，但是他的字畫，尤其是畫鶴，却冠絕一時，稱爲神品。杜甫觀賞通泉縣署壁後薛稷的畫鶴，懸善寺中一觀觀三大字一和西方諸佛變相圖，想到薛稷的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一詩，他這樣稱讚他：「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觀薛稷少保畫畫壁）

他除去按照情形不同，歌詠這三人的性格，功業或藝術外，他對於每個人都提到他們代表的詩篇，這些詩是那健康時代的代表聲音，杜甫對之懷有無限的嚮往，所以他說這次的旅行：「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

他在梓州一帶也遇到一些新知和故舊：如「梓中豪俊」嚴二別駕，「人好鳥亦好」的射洪李四丈，相約同煮茯苓的閬州嚴氏漢主人；「往還二十載」的章贊善，經營草堂時向之索求松樹秧和大色盤的章班，「童稚情親四十年」的路六侍御，一亂後今相見一的元二，以及他的舅父崔都水翁，和在閬州會見的二十四舅和十一舅。但是那些新知多半是偶然相識，彼此一度傾心，隨後也就沒有繼續更深的友情；舊則是異地重逢，多半是「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送路六侍御入朝）。他們對於杜甫的生活，如輕風掠水，沒有多大影響，在這裏我們不能不略爲提及的只有漢中王李璠和房瑄。

漢中王璠是汝陽王璣的弟弟，一早有才望，備儀表，初爲隴西郡公，天寶十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討漢中王，（舊唐書本傳）。杜甫在長安初期曾經得到過李璠不少的幫助，而李璠則是杜甫的「一忘形故人」（見追贈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序）。天寶十三載秋長安霖雨，杜甫曾有詩奉寄，深以囑於行潦，不能晤面爲苦，如今李璠出爲蓬州刺史，帶梓州，二人相見，「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因爲他們都在五十左右，而杜甫從乾元元年出爲華州司功到如今正是第五個秋天。杜甫本想與李璠飲酒話舊，不料李璠正在斷酒，旁邊還貼着戒酒的座右銘，感到無限的失望，縱使一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也只有自醉了。次年（廣德元年）秋，李璠又來梓州，曾在水亭中與章彝，攜手席談，杜甫相會。杜甫在這時期內寄給他的詩並不算好詩，但一方面感王門舊遊，喪亡殆盡，一方面又泣感愁顏，故作詩話，使人聯想起死去的李璠和遠謫台州的鄭虔，而感到無限的蒼涼。

房瑄自乾元元年六月貶爲鄧州刺史，上元元年四月改禮部尚書，隨後又出爲晉州刺史，八月改爲漢州刺史；廣德元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這是代宗即位後，房瑄嚴武一派又漸漸得勢的徵象。杜甫在這年晚春自梓州送辛員外至綿州，又從綿州到後州，可是杜甫到時，房瑄已經起程赴京。他不見故人，只能泛舟於故人在汶州城西北角開鑿的房公西湖，在舟前對着成羣的小鷓鴣寫出一鷓鴣黃似酒，對酒愛鷓兒一那樣天真而有情趣的詩句。房瑄走到閬州，便因病不能前進，八月四日死於僧舍，杜甫於九月又從梓州趕到閬州，吊唁這位與他一生運命有深切的關連的同鄉知己，在九月二十二日寫了一篇沉痛的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他還念念不忘屢難時疏救房瑄，一伏奏無成，終身愧恥！」

綿州梓州屬劍南東道，閬州屬山南西道，前者以及涪城射洪通泉等縣都臨近涪水，後者則被閬水（即嘉陵江）環繞。射洪雖產生陳子昂，但陳子昂並沒有給這一帶的山水揭開面幕。反倒是四傑中的王勃，盧照鄰揚州起始歌詠這裏的山川建築，而牠們爲世人所知，生動地呈現於遠方人的面前，則要歸功杜甫了。

「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鄧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人們只要虛心觀看，到處會發現自然中的美，杜甫是一個最善於觀看的發現者。我們前邊說過，杜甫爲了衣食不得不陪着那些刺史縣令宴會，不得不迎送來往的官吏，宴會的場所多半設在寺院或園亭，迎送的地方不外江邊或郊野，那些陪宴詩，送別詩是不得已的酬應，沒有深厚的感情，有的甚至淺薄乏味，但是宴會與迎送却無形中給與杜甫一個機會，即是更多一

些觀看周圍的山水。

像是「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客亭)，「花雜重重樹，雲輕處處山」(涪江泛舟送章班歸京)那些後代畫家常常用以題他們的畫本的詩句還可以代表一般的山水；「一畫竹筍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放船)，「已經蜀中的景色了；至於「青山意不盡，衰衣上牛頭」(上牛頭寺)，「閬州城東畫山白，閬州城北玉台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閬山歌)，則完全是梓州閬州的山水圖，我們不但由此看得見山水的形勢，並且好像還聽得見山水的聲音。杜甫不但是個在旅途，或是陪奉官吏朋友，就用他的獨創的詩筆給我們描畫出一幅川北百餘里的長卷。我們望見綿州西北的越王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等丈清」，涪城山腰上的香積寺官閣，「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梓州城北長平山上的惠義寺，西南牛頭山上的牛頭寺，南山上的兜率寺，閬州城北的玉台觀和觀內陳王元嬰修造的亭子，還有南池畔漢高祖的祠廟「終朝走巫祝，歌舞敬靈衣」。我們更由於杜甫才知，「閬州城天下稱」(閬水歌)，「道泉縣北十五里的山水是「一川何綺麗的盡日窮北觀」。

在道場的山水中他到處奔走，始終是作客的情懷，沒有作過令任的打算。他一方面惦念草堂，一方面又作東遊的計劃。他在成都亂後，會遠從綿州入梓州，「十步一還首」，不知說花草堂還存在沒有(從事行)。後來同成都一次，接取妻子，才知道草堂在大亂中幸而安然無恙。但先以亂後不定，難以成都受到吐蕃的威脅，同時他又想東遊失楚，雖然有老友范德節度西川，也只好把草堂放棄了。然而他對於草堂總不能忘懷。每逢有人同成

都，他都囑託他去看一看他的草堂。他這章郎可直歸成都時說：「為閬南溪竹，抽梢合過橋」，送賈九歸成都也說：「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他在奇麗江外草堂詩中把經營草堂的始末和不得已離開草堂的原委，寫得詳盡而親切，最後還一再以堂前的四棵小松為念。並且他常常打發他的弟弟杜占同去探視草堂，還諄諄地囑咐他：「一鶴鳴宜長數，榮荆莫浪開，東林影薄，臘月更須栽！」(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聯示此詩)

他在成都時就常常想沿江東下，如今蜀中不靖，更加強他的東征之念，他於是進一步作具體的準備。使他不能成行的只是旅資無法籌措，寶應元年冬訪陳子昂故居時，他就向射洪的李四丈說：「南京(成都)半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簷秋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等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他先只是想到江南，次年春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念及東京的田園，一時興奮，便想「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這是很堅定的語氣，好像立即可以成行了，但仍然是因於旅資，一步也不能走動。隨後梓州登樓，遙望故園，追思吳會，念蜀中交遊冷落，「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也只是徒託幻想。所以他在涪江邊送他的舅父崔都水使下峽歸洛陽時，說出這樣哀婉的話：「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直到這年九月因為房瑄之喪，第一次赴閬州，他仍然感慨「故園見何日」，有時竟覺得長此「飄蓬無定所」，也實在疲倦，索性就在嚴氏溪附近遷居下去(見嚴氏溪放歌)。

至於他東遊的計劃漸漸能夠實現，則在他三月後嚴瑄因為一女病憂憂一再入梓州時。旅費多半是章奉和他們的幕府諸公所贈。臨別時，章奉為杜甫設筵餞行，樓前出馬，帳下羅賓，紅旗招展中，到日落為歸，飲筵還沒有結束，暫後杜甫向主人說：「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安書，無使長迴首。」(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章奉並以梓中特產桃杖杖相贈，他拿到手裏想到路途的艱難，興奮地向桃杖杖說：

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噫風塵瀟瀟兮射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焉從？他決定東征，在廣德二年初春攜妻子至閬州，以便沿西漢水(即嘉陵江)至渝州東下。這時或許由於嚴武的推薦，朝廷召杜甫為京兆功曹，但他東遊計劃已定，只好拒絕了。但是當他向各方面寄詩辭行，準備起程時，嚴武又拜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他聽到這個消息，浣花草堂又在他的心中增加了分量，致使他立即放棄既定的行程，決定同成都。他「殊方又喜故人來」，寫成奉待嚴大夫及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等詩，詩調是那樣的揚揚流利，給這一年又七月沉鬱的生活作一個快樂的結束。

他臨行前，駐馬孤墳，和地下的房瑄作了最後的訣別，於是率領妻子又作西川遊了。他上次冬晚獨自一人由閬州回梓州時，一路是「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輟場，江風蕭蕭雪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發閬中)，時隔不及三月，依然是接應橋斷，林樹凋殘，人煙稀少，而杜甫一家大在這裏穿行，「僕力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魘魅，屏弓落欲驚」(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我們只聽見一片笑樂的聲音。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平字第二三四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 新路周刊

發行者：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  
編輯部：電話四局〇八五九號  
經理部：電話四局〇六九三號  
北平東直門大街九十八號  
上海辦事處：電話四二二五五五五號  
上海黃浦路十七號五一室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訂銷辦法：  
一、本刊歡迎直接定閱八折優待，在定閱期間不受中途刊費加價之影響，郵資漲價酌扣，書刊期滿前另函通知。  
二、本刊零售每份每冊金券一角五分，預定三個月照價八折加郵費如下表：  
(月個三)  
平寄：金券一元五角  
掛號：金券一元七角  
航平：金券二元二角  
航掛：金券二元四角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三、外埠批銷每期至少在十份以上，照價七折郵費外加一律存。  
四、學生團體訂閱特定期特辦法，預定三個月每份在十份以上者七五折，二十份以上者七折。  
五、寄遞方法請來函說明，舊戶續定或有查詢事項務請註明戶號。  
六、本刊每逢星期六在上海北平兩地同時出版，凡華北區定戶請向北平本刊經理部洽定，其他各區請向本刊上海辦事處洽定。

本期定價金券一角五分